臺大歷史學報第 76 期
2025 年 12 月，頁 39–87

BIBLID1012-8514(2025)76pp.39–87
2024.1.8 收稿，2024.12.20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512_(76).0002

1913 年北部邊疆戰爭及其對中蒙分界的影響

張　臨　希*

提　要

外蒙在宣統三年（1911）脫離清帝國後，欲建立一統全蒙古的政權。受此影響，民國未及接管的內蒙牧廠、喇嘛廟紛紛外附，成為外蒙的軍事基地與聯絡網。外蒙遂依靠俄國幫助，以內蒙將領為先導，在 1912 年 10 月 25 日南下內蒙、1913 年春西進阿爾泰。戰爭席捲北部邊疆，造成民國與外蒙政權的最大衝突。北京政府冊封內蒙章嘉、甘珠爾瓦兩位活佛以削弱外蒙教權影響，封禁內蒙糧運以遏制外蒙軍隊南下，並針對蒙軍戰術缺陷實施「跳廟作戰」，逐一拔除據點。1913 年夏，熊希齡、馬福祥翦除外蒙南下內蒙的東、西兩路，將蒙軍限制在中路；楊增新、帕勒塔阻止外蒙西進阿爾泰。此時南方二次革命突發，外蒙趁機擴大戰爭動員，北京政府優勢頓挫。二次革命結束後，北京政府密促蒙軍中的內蒙將領歸附，又統籌陸軍第一師、毅軍、奉軍等不同區域兵團聯合作戰，扭轉內蒙中路戰局，迫使俄國督促外蒙撤軍。1913 年末，北京政府與庫倫當局劃定停戰線，其南段使內外蒙之間的地方性旗界上升為國家軍事防禦線，其西段則切開阿爾泰烏梁海、新和碩特、新土爾扈特各部，改變清朝以部落地域為邊的傳統，影響日後的中蒙兩國分界位置。

關鍵詞：熊希齡　袁世凱　辛亥革命　北京政府　外蒙古

*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助理研究員
100080 北京市海淀區蘇州街 16 號；E-mail: zhanglinxi@pku.edu.cn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外蒙西進與醞釀南下
二、內蒙初期戰爭與北京政府應對
三、內蒙全面戰爭與北京政府抵抗
四、二次革命與南下、西進終結
五、停戰協約與軍事分界形成
結 語

前 言

清帝退位前後，外蒙庫倫當局執「泛蒙古意識」，欲建立一統全體蒙古人的政權，遂於 1913 年攻入內蒙、阿爾泰等地區，造成「二十世紀中國和蒙古之間最大的衝突」，[1]時稱「丑年之亂」。身在前線的熊希齡（1870–1937）感歎「庫倫倡亂，牽動全蒙」，[2]足見戰爭席捲範圍之巨。北京政府力戰維持北方廣大地域，使民國實際控制區與外蒙之間形成停戰線，乃至改變清光緒朝規定的西段區劃，從而影響日後的中蒙國界位置。

學界已對這場戰爭諸方面有所探討：彭查格諾羅布分析民族意識在內外蒙古產生不同作用，黃麗生進而指出內外蒙古的民族意識本身有別，導致兩者難以統合；[3]別洛夫（E. A. Белов）、海爾（Paul Hyer, 1926–

1 周太平，〈關於博克多汗軍隊 1913 年向內蒙古採取的軍事行動〉，收入齊木德道爾吉主編，《蒙古史研究》第 7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頁 486。

2 〈熱河改建行省議案〉（1913 年春），收入周秋光編，《熊希齡集》第 3 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以下省略編者），頁 363。

3 彭查格諾羅布著，亦鄰真譯，〈活佛政府為建立「大蒙古國」而進行的鬥爭〉，收入內蒙古大學歷史系蒙古史研究室編，《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第 9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1964），頁 43–48；黃麗生，《蒙古意識與中國認同的糾葛：民初外蒙古獨立運動與內蒙古的反應》（臺北：蒙藏委員會，2002）。

臺灣大學圖書館

2018）注意到內外蒙古社會差異、內蒙不同地區領導主觀差異對戰局的影響；[4]藍美華指出庫倫當局效能低，無法協調以上差異，導致南下失敗，也迫使外蒙在二次獨立時放棄內蒙。[5]橘誠強調了宗教在外蒙政權建設中的作用，周太平考察庫倫當局統一蒙古的願望與實踐，突出戰爭對亞洲民族運動的影響，這兩位學者對戰爭本身的研究集中在錫林郭勒盟地區，注意到盟長被俘事件、內蒙各旗態度、內蒙士兵加入外蒙南下作戰等重要問題，但較少涉及其他戰線，未能揭示戰爭全貌。[6]上述研究蒐集日本外務省情報檔案、俄國與蒙古國檔案，但較少挖掘中方史料，即便以中方史料為主的著作，如軍事科學院編《中國近代戰爭史》，也僅用了一份察哈爾都統何宗蓮（1864–1931）戰報簡述部分戰役，[7]因此學界尚未得窺戰爭全貌，以及北京政府在困境中的應對策略。如橘誠直言：現有研究「尚未揭示袁世凱的懷柔手段」，以致未能綜合考察俄國、外蒙、北京政府在內蒙的角力。[8]在戰爭結果方面，李毓澍（1919–1995）詳述外蒙與阿爾泰（新疆）停戰線形成過程，徐建平指出此線改變了部落的習慣線，但學界並未探討戰爭對國家層級中蒙分界的影響。[9]

4 E. A. 別洛夫著，陳春華譯，〈1912 年至 1913 年期間喀爾喀軍隊進犯內蒙古〉，收入齊木德道爾吉主編，《蒙古史研究》第 8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頁 342–347；保羅・海爾（Paul Hyer）著，烏蘭少布譯，〈蒙古獨立運動中的內蒙古 1911–1914〉，收入內蒙古大學中共內蒙古地區黨史研究所編，《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 1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頁 94–113。

5 藍美華，〈內蒙古與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漢學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2005 年 6 月），頁 393–425。

6 橘誠，〈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内モンゴル統合の試み――シリーンゴル盟を事例として〉，《東洋學報》第 87 卷第 3 號（2005 年 12 月），頁 351–382；橘誠，《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研究：モンゴル建國史序説 1911–1921》（東京：風間書房，2011）；周太平，〈關於博克多汗軍隊 1913 年向內蒙古採取的軍事行動〉，頁 460–487；周太平，《二十世紀前內蒙古政治變遷史研究——丑年之亂考》（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

7 軍事科學院編，《中國近代戰爭史》第 3 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4）。

8 橘誠，〈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内モンゴル統合の試み〉，頁 375。

9 詳見李毓澍，〈科阿分界研究〉，收入氏著，《蒙事論叢》（臺北：里仁書局，199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未解之謎，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眾所周知，清朝在南方辛亥革命與北方外蒙分離的雙重打擊下終結，一年半後的北京政府，卻在南方二次革命與北方外蒙南下的雙線作戰中熬過難關。保住內蒙的軍事行動，凸顯北京政府對中國現代疆域形成的重要性，但這一系列運作多數不為人知。本文利用近年出版的《辛亥時期袁世凱秘牘（靜嘉堂文庫藏檔）》、《袁世凱全集》、收錄顧廷龍藏「熊希齡遺稿」的《熊希齡集》，並結合民國《政府公報》與各檔案館未刊檔案，解讀北京政府的困境、應對部署、戰線演進，及其對日後中蒙分界的影響，以探明戰爭全貌。

一、外蒙西進與醞釀南下

16 世紀晚期以來，黃教逐漸成為蒙古各部的共同信仰，深切影響各部落的政權結構。清朝以蒙古為藩屏，先後分化漠南諸部為六盟四十九旗、漠北喀爾喀為四部八十六旗，採用眾建多封、使其互不統屬的手段，避免蒙古力量聯合，導致漠南、漠北之間出現地方性旗界。同樣，為分化兩地教權，清廷並設漠南章嘉活佛、漠北哲布尊丹巴活佛兩位宗教領袖。其中章嘉活佛長期駐京，不易形成地方權力中心，但哲布尊丹巴活佛長期駐錫庫倫，在漠北地位神聖：

> 蒙人奉之若神，尊之若帝，居然一不可驚犯之教主……蒙人之信仰該佛者，雖相隔數千里之遙，年中以還願為名，於四月之間即匍匐就道。食不飽、衣不暖，經數十日之久抵庫。以在活佛門首得一叩頭為畢生幸事。尤可異者，每年於六月舉行丹書克故事之時，全蒙以為盛典。各旗王公貝子胥為之奔走服役，無所不至。[10]

頁 119–170；徐建平，〈清中期以來阿爾泰山地區分界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3 期，頁 56–67。

10 佚名，〈調查蒙古邊務意見〉（宣統三年），收入畢奧南整理，《清代蒙古遊記選輯三十四種》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頁 64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外蒙喀爾喀四部甘心為其效力。因此外蒙趁辛亥革命脫離清廷後，共推八世哲布尊丹巴（1869–1924）為政教合一的領袖「博克多汗」，以在名義上統御外蒙，造就庫倫當局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僅憑黃教不足以領導世俗世界，政權需要建立政府架構。當局初創時未設總理，由內務部負責政府全局事務，兼管黃教，[11]地位高於外務、財政、司法、兵四部。內務部首腦由活佛助手達喇嘛車林齊密特（1877–1914）擔任，行總理之實。他在 1903 年由庫倫商卓特巴（寺廟事務官）升任達喇嘛，[12]從未管理過蒙旗，權威遜於身為成吉思汗子孫的各旗王公，亦缺乏指揮喀爾喀四部的行政經驗，因此藉推行「大蒙古國」理念來獲得權勢。俄國政府代表記錄他在 1912 年秋「俄蒙」庫倫會議上的陳詞：

> （外蒙喀爾喀）與內蒙同其命運……倘若喀爾喀坐視南蒙、東蒙（註：即內蒙古西、東兩部分）成為奴隸，以作自己獲得自由之代價，則不如全體蒙人聯合起來，大家死在一處為善。[13]

車林齊密特的態度極為激進。外蒙第一次獨立前後，有部分內蒙、呼倫貝爾、新疆北部蒙古人因「民族意識」而奔赴外蒙任職，使庫倫當局的內蒙色彩濃厚，主要官員如表一所示。

這些內蒙人在外蒙原無根基，如欲立足，首先想到的就是向故地發展，這與車林齊密特的需求一拍即合，成為其合併內蒙構想的執行者。他們迅速凝聚成集團，在庫倫當局組建初期擁有很大勢力。[14]

---

11 周學軍，〈哲布尊丹巴政權「內閣總理大臣」設置考——兼與呂一燃先生商榷〉，《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 3 期，頁 69–82。

12 〈為巴特瑪多爾濟補授額爾德尼商卓特巴暨車林齊密特補授達喇嘛事〉（光緒九年五月十九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典藏號：03-18-009-000124-0002-0016。

13 廓索維慈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上海：中華書局，1932），頁 63。

14 中見立夫著，甘旭蘭譯，〈海山與烏泰——博格多汗政權下的漢南蒙古人〉，收入內蒙古大學編，《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 3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頁 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表一　部分在外蒙任職的內蒙、呼倫貝爾、伊犁人

人　物	出　　身	在外蒙職務
棍楚克蘇隆	科爾沁左翼前旗（賓圖旗）郡王銜札薩克	1912 年夏任副總理大臣
那遜阿爾畢吉呼	科爾沁左翼後旗閒散鎮國公	陸軍大臣顧問
達木丁蘇隆	呼倫貝爾	鎮國公、外務部副大臣
陶什陶	郭爾羅斯前旗台吉	兵部副大臣
巴布扎布	土默特左旗，彰武縣警長	鎮國公，外蒙東南邊界官
海山	喀喇沁右旗梅楞章京	內務部司官
烏泰	科爾沁右翼前旗郡王銜札薩克	兵部副大臣
蘇米亞	伊犁察哈爾蒙古總管、鎮國公	達里岡愛守備大臣

資料來源：博彥滿都，〈我所知道的賓圖王棍楚克蘇隆〉，收入內蒙古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內蒙古近現代王公錄》（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史書店，1988），頁 134；別洛夫，〈1912 年至 1913 年期間喀爾喀軍隊進犯內蒙古〉，頁 345；阿拉坦巴根，〈1913 年錫林郭勒——察哈爾戰事初探〉（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碩士論文，2008），頁 12；陳籙，〈駐紮庫倫日記卷一〉，收入氏著，《蒙事隨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64；中見立夫，〈海山與烏泰〉，頁 64、77；周學軍，〈達里岡愛被外蒙古占領時間考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 年第 4 期，頁 109。

此時庫倫當局可控範圍僅限偏東的土謝圖、車臣兩汗部，但新集團迅速展現擴張本領：在東面，呼倫貝爾 1912 年初受庫倫當局勸誘，[15]建立了自治政府，形成外蒙東面的緩衝地帶；在西面，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兩城尚為北京掌管。1912 年 1 月，來自內蒙的海山（1862–1917）、陶什陶（1864–1922），來自呼倫貝爾的達木丁蘇隆（1871–1921）等將領圍困烏里雅蘇台，宣稱喀爾喀四部八十六旗「已共戴哲木（布）尊丹巴為主，滿洲官員應全驅逐，限日將倉庫、銀、緞、軍裝等交出回籍」。[16]

15 周樹模，〈庫倫勸告蒙旗獨立已調隊馳往彈壓〉（1912 年 1 月 15 日），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清宮辛亥革命檔案彙編》第 74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 307。

16 中華民國外交部政務司文書科編，〈庫倫、烏里雅蘇台「獨立」案〉，收入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頁 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1868–?）棄守，該城陷落，至此喀爾喀四部皆歸庫倫當局管轄。5、6 月間在俄國支持下，庫倫當局下令「將西部科布多一帶的滿洲和漢人官員全部趕走，並將科布多地區的所有官方事務轉交給總理喀爾喀事務衙門」。[17]陶什陶等內蒙將領繼續率五千軍隊，支援外蒙將領馬格薩爾扎布（1877–1927）、俄國籍「黑喇嘛」丹必占燦合攻科布多。圍城戰役遭遇駐守科布多長官溥潤抵抗，馬格薩爾扎布舉行薩滿血祭，調動蒙軍士氣：

> 把中國士兵的屍體剖開，取出心臟，獻祭給蒙古軍隊總指揮官的戰旗，然後馬格薩爾扎布和其他的軍官們嚐了五個中國士兵的血。他還下令蒙古士兵們也嚐嚐，以顯示他們英勇的決心。[18]

丹必占燦甚至專門為舉行這個儀式而殺俘虜，用以激發戰鬥力。8 月 28 日，蒙軍攻陷科布多城，[19]原不在喀爾喀蒙古範圍內的科布多地區歸入庫倫當局掌控（1913 年繼續由科布多向西進攻阿爾泰的軍事行動，見本文第四節）。

外蒙範圍西擴至科布多，接近現在蒙古國疆界範圍，加大了中俄之間的緩衝地帶。俄國極其歡迎此種軍事行動，稱讚「外蒙自治區域版圖，沿西比利亞（註：西伯利亞）界線一帶，大為擴張。」[20]新集團占領科布多後，權勢大增，引起哲布尊丹巴不安，他立即於 1912 年 7 月增設總理大臣職位，以位置偏西的賽音諾顏部親王那木囊蘇倫（1878–1919）擔任，一方面增加對外蒙西部地區的控制，一方面分化車林齊密特與內蒙人集團的權力，[21]導致出身內蒙官員的地位下降。這種變化被袁世凱（1859–1916）捕捉，認為外蒙已起內亂，海山與陶什陶等軍事將領互相

17 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著，苑默文譯，《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臺北：時報文化，2021），頁 107–108。

18 迪倫，《蒙古國》，頁 108。

19 詳見中華民國外交部政務司文書科編，〈蒙兵進犯科布多案〉（1912 年 7–12 月），收入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 7。

20 廓索維慈，《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31。

21 詳見周學軍，〈哲布尊丹巴政權「內閣總理大臣」設置考〉，頁 69–8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猜忌，民國只需以靜制動，便可坐收漁利。畢竟民國初建，鞭長莫及，北京政府只得消極應對，除了成立蒙藏事務局、頒布《蒙古待遇條件》外，對外蒙並無激進舉措。袁世凱與孫中山（1866–1925）會晤時，提及庫倫道路遙遠，擔憂貿然出兵，不僅無法收復外蒙，更可能丟失內蒙，[22]應妥慎以對。

但時局並未如袁世凱預料，庫倫當局仍執著於合併內蒙，否則「就是不愛國，就是背信棄義」。[23]來自內蒙的官員更面臨現實問題：身為客居者，不能僅止於擁抱掌權者，更須征服故地，以鞏固地位，因此更為激進。但庫倫當局並無南下實力：「逆佛屢要求四大汗各徵兵一萬，但蒙古地廣人稀，生殖極寡，一萬之數，十年亦不能達目的，盡多每汗不過二三千而已。」[24]兵、餉、武器皆不能自足，必須依靠俄國援助。1912 年 10 月，庫倫當局與俄國草擬《俄蒙協約》時，即希望俄國支持它合併內蒙。[25]但俄政府有自身的安全困境，並不贊同「泛蒙古主義」。俄國代表明確提出：「俄國外貝加爾湖地區，亦有蒙古種之布里亞特人，因此蒙古國家主義者，如欲聯合全蒙組織一大蒙古國，不僅將與中國作戰，且將與俄國開戰。」[26]事實上俄政府的戰略目標，在於讓外蒙成為中俄兩國的緩衝地，禁止中國駐軍、移民、採礦，以便獨占資源，但不希望外蒙過度擴張。於是俄國拒絕將內蒙問題列入協約，並警告庫倫當局切勿合併內蒙，以免迫使北京政府出兵，因為俄國「不可能像保衛外

22 詳見〈與孫文談征蒙〉（1912 年 9 月 8 日），收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第 20 卷（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以下省略編者），頁 383。

23 〈對蒙談判全權代表致外交大臣電〉（1912 年 10 月 11 日），收入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編——關於蒙古問題》（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以下簡稱《俄書》並省略譯者），頁 86。

24 胡太才，〈偵蒙記〉，收入忒莫勒等主編，《中國邊疆研究文庫・初編・北部邊疆卷》第 2 卷（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以下簡稱《北部邊疆》並省略編者），頁 69。

25 詳見廓索維慈，《庫倫條約之始末》，頁 65。

26 呂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頁 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蒙那樣保衛內蒙」。[27]

俄國雖然不支持南下，但可以有償向外蒙提供武器，[28]並早在 1912 年初售予外蒙快槍 40,000 桿、子彈 4,000 箱、大炮 8 尊，[29]該年夏天已見受徵集的士兵們聚集在庫倫街頭，拿著俄國提供的新槍支，但尚不知怎樣使用。[30]爾後外蒙當局聘用俄武官 12 員，訓練蒙兵射擊方法，[31]可以說俄國全面參與了外蒙的軍隊建設。雖然俄方辯稱武器不是為了供外蒙攻打內蒙，[32]但俄國實際上並不能控制外蒙將武器用在何處。如此明來暗往，更增加外蒙底氣。1912 年 11 月 3 日《俄蒙協約》並附《俄蒙商務專條》簽署後，俄國取得獨占外蒙利益的地位，外蒙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附庸於俄國，這也促使庫倫當局認定無論採取何種行動，只要既成事實，就能得到俄國援助。

協約簽署的消息傳到中國內地，輿論一片譁然，紛紛指責政府外交不力。山西督軍閻錫山（1883–1960）、廣東督軍陳炯明（1878–1933）、長江巡閱使譚人鳳（1860–1920）、安徽都督柏文蔚（1876–1947）、阿爾泰長官帕勒塔（1882–1920）等人都要求出兵外蒙。北京政府表現軟弱，不敢進取惹怒俄國，袁世凱為鉗制輿論，令國務總理趙秉鈞（1859–1914）禁止各報館登載《俄蒙協約》相關消息。[33]同時，袁氏制止各地軍政長官的出兵請求，電告閻錫山「此事關係俄國，伐蒙即是攻俄」，[34]又對陳炯明解釋「此事俄人多方干涉，正與嚴重交涉，必須議有頭緒，方可

27 〈遠東司司長致駐庫倫領事呂巴電〉（1912 年 8 月 12 日），收入《俄書》，頁 42–43。
28 詳見〈遠東司司長致庫倫總領事呂巴電〉（1912 年 8 月 31 日），收入《俄書》，頁 52。
29 胡太才，〈偵蒙記〉，頁 69。
30 札奇斯欽，《羅布桑車珠爾傳略》（呼和浩特：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頁 83。
31 胡太才，〈偵蒙記〉，頁 94。
32 〈遠東司司長致庫倫總領事呂巴電〉（1912 年 8 月 31 日），頁 52。
33 〈與國務總理趙秉鈞密議俄蒙條約後之局勢與對策〉，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1 卷，頁 59。
34 〈批山西都督閻錫山元電〉，收入劉路生、駱寶善、村田雄二郎編，《辛亥時期袁世凱秘牘（靜嘉堂文庫藏檔）》（北京：中華書局，2014；以下省略編者），頁 713。

臺灣人學圖統期刊資料庫

用兵。然仍須通盤籌劃。餉械最要，至少亦須廿萬人」，[35]認定必須擱置軍事，交由中央通盤籌劃，交涉解決。首先，北京政府照會俄使抗議：「蒙古為中國領土，雖地方不靖，萬無與各外國訂條約之資格，茲特正式聲明，無論貴國與蒙古訂何種條款，中國政府概不承認」；[36]其次，外交部令各駐外使節製造輿論，抗議俄國破壞領土的行為，但成效不彰。隨後外交總長梁如浩（1863–1941）辭職，陸徵祥（1871–1949）繼任，並於 1912 年 11 月 30 日開始與俄國駐華公使庫朋斯齊（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упенский, 1869–1945）在北京談判，主張將取消《俄蒙協約》作為前提，立即被俄使拒絕，中俄就外蒙問題舉行的「陸庫會議」即以中方被動為始。眼見北京政府始終軟弱應對，庫倫當局認為時機來臨，於 1912 年秋季開始南下行動。

二、內蒙初期戰爭與北京政府應對

庫倫當局對內蒙有其獨特的聯絡方式。蒙地篤信黃教，家家皆有信徒，禮佛為蒙古人的日常。如匯宗寺等內蒙寺院由外蒙各旗提供喇嘛，哲布尊丹巴在此很有影響力。遍布內蒙各旗的喇嘛，組成了庫倫當局的聯絡網。

北京政府忽視喇嘛生計，也加速內蒙部分喇嘛倒戈。清朝凡在冊喇嘛均由朝廷發給錢糧，但清末困頓，時有拖欠；民國初建，亦無暇顧及，喇嘛生計愈發艱難，便有聯絡外蒙想法。如 1912 年「匯宗、善因二寺諷經喇嘛僧徒錢糧，外蒙各旗獨立，未能供給，欲通庫倫」。[37]政教合一

35 〈批廣東陳炯明東電〉，收入《辛亥時期袁世凱秘牘（靜嘉堂文庫藏檔）》，頁 713。

36 陳崇祖，《外蒙古近世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頁 44。

37 〈多防鎮守使王懷慶呈大總統擬照去年成案將匯宗、善因二寺諷經喇嘛僧徒應得錢糧銀兩數撥發請示遵文並批〉（1913 年 9 月 6 日），收入烏力吉套格套整理校註，《民國《政府公報》蒙古資料輯錄》第 1 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以下簡稱《政府公報》並省略整理者），頁 4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庫倫當局對來投者很慷慨，如「札薩克圖旗布喇嘛卜各巴牙（註：布和巴彥）、協理額青各、梅倫齊木特色冷三員，來歸活佛，發給別列旦槍一千二百桿，子彈五十萬粒。」[38]這類受賞者，回到內蒙便四處鼓動，帶領僧俗兩界響應，展開廣泛的內蒙基層動員：

> 庫倫細作喇嘛持哲布尊丹巴法旨，到處先行籠絡各旗呼圖克圖大喇嘛，繼以謀亂各處。呼圖克圖大喇嘛因服從黃教，聲氣相通，往往被其所陷，蒙眾響應，即有不可收拾之勢。[39]

誘惑之下，內蒙寺廟紛紛倒向外蒙，對北京政府而言，形勢極為嚴峻。如之後民國軍隊在滂江戰敗，即因借宿寺廟，「不料夜裏，廟中喇嘛忽然亮出武器，變成了蒙古軍，把借宿的營兵全部殺死」。[40]加之內蒙東部烏泰叛亂，大量流民攜帶武器躲入索倫山中，僅經東三省政府勸返者就有 20,000 餘人之多，[41]這些流民一經煽惑，便轉為流寇。不久，昭烏達盟（以下簡稱昭盟）也被波及：

> 老河北廟內有蒙民男女千餘人在此避難，又有昭格廟高喇嘛、吳喇嘛帶匪三四百人逼令某旗公爺與彼連和（註：聯合），奈曼旗大吉爾家住有冒名巡警五六十人，拉趕牛、馬、駱駝、煙葉、瓜子等物，是匪是民是兵不可辨認。[42]

更嚴重的是，這些匪徒發現外蒙政權為他們劫掠地方提供了正當性，昭

38 內蒙古檔案館編，〈關於「烏泰事件檔案選錄」〉，「國務院致趙爾巽電」（1912 年 7 月 2 日），《內蒙古檔案史料》1993 年第 3 期，頁 7。

39 〈蒙藏事務局呈大總統開單代遞額爾德呢默爾根呼圖克圖等賮品請均鑒並批〉（1913 年 1 月 27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1 冊，頁 325。

40 金啟孮，《北京郊區的滿族》（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頁 69。

41 內蒙古檔案館編，〈關於「烏泰事件檔案選錄」〉，「宋小濂致趙爾巽函」（1912 年 10 月 13 日），《內蒙古檔案史料》1993 年第 3 期，頁 19。

42 「昭烏達盟慰問員周正朝為呈報事」（1912 年 12 月），收入〈蒙藏事務局呈報錫盟各旗擁護共和政體及蒙匪擾亂情形等文書〉（1912 年 10 月–1913 年 12 月），《國務院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以下省略館藏地），典藏號：1002(2)-72，頁 103–1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盟扎魯特旗官保扎布即聲稱其為哲布尊丹巴所派，率眾圍攻該旗札薩克貝勒府，而後炮斃札薩克、搜搶屋內財物。[43]流民、匪徒、喇嘛結合成蒙軍，以庫倫當局為護身符，行劫掠之實。

北京政府面對這道難題，首要任務是消解外蒙教權控制。此時內蒙宗教首領章嘉活佛（第七世，1890–1957）隱身在錫林郭勒盟（以下簡稱錫盟）阿巴嘎旗觀望事態，態度並不明確。9 月初蒙藏事務局會同遜清內務府，令所屬牧廠總管「前往錫林郭勒盟一帶地方迎迓章嘉呼圖克圖」，[44]章嘉遂於舊曆 7 月 28 日啟程赴京。隨後，甘珠爾瓦活佛（第十六世，1854–1913）受到感召，極力勸導逃向庫倫的錫盟布錫活佛、烏蘭察布盟（以下簡稱烏盟）杜英活佛，以及察哈爾蒙古三總管及蒙古官員、徒眾等 40 人回歸。[45]四位活佛先後來京晉謁大總統，遏止了外投風潮。10 月 19 日袁世凱褒獎章嘉活佛「道行高超，湛深教旨」，賜宏濟光明大國師封號；25 日又以「翊讚共和，厥功甚偉」，提高甘珠爾瓦活佛地位，[46]將察哈爾右翼四旗、左翼四旗、三牧場各喇嘛廟分別歸兩位活佛管理，[47]這實際上是沿用清廷對黃教眾建多封的策略，把察哈爾教權分為兩部分，西歸章嘉、東歸甘珠爾瓦，互相制約、避免獨大。自此章嘉往返於各旗之間，負起宣傳共和的責任。稍後錫盟局勢動蕩，蒙藏事務局便傳告章嘉等設法開導。[48]就此，民國初步獲得抗衡外蒙教權的力量。

---

43 「昭烏達盟慰問員周正朝為呈報事」（1912 年 12 月），頁 103–104。

44 總管內務府，〈為查明迎迓章嘉呼圖克圖來京正白旗羊群協領拉木色楞應予獎敘等項事致察哈爾都統衙門〉（1912 年 12 月），《內務府呈稿》（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典藏號：05-08-033-000010-0045。

45 〈蒙藏事務局覆國務院秘書廳擬訂章嘉呼圖克圖等來京晉謁大總統待遇禮節單請查照函〉（1912 年 9 月 19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1 冊，頁 131。

46 以上引文出自〈獎賞章嘉呼圖克圖令〉、〈獎賞甘珠爾瓦呼圖克圖令〉（1912 年 10 月 19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0 卷，頁 524、525。

47 詳見〈批蒙藏事務局擬將察哈爾右翼四旗及左翼四旗三牧廠各寺廟喇嘛分別歸章嘉呼圖克圖暨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管理請鑒核示遵文〉（1912 年 10 月 25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0 卷，頁 546。

48 〈署理察哈爾都統何宗蓮等呈報事〉（1912 年 12 月 4 日），《國務院檔案》，典藏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佛教勸導作用有限，對抗必需軍隊。清朝視蒙地為其後院，避免漢人官吏染指，民國在此地的軍力不足。1912 年秋平定烏泰、官保扎布叛亂後，北京政府軍進入洮南、開魯、綏東等地，但零星分布難以應付危局。而控馭內蒙的重鎮綏遠、察哈爾、熱河，多由前清任命的滿人擔任將軍、都統。袁世凱於 10 月 12 日任命張紹曾（1879–1928）為綏遠將軍，11 月 1 日任命何宗蓮、傅良佐（1873–1924）為察哈爾正副都統（何之前為署理），12 月 15 日任命朱泮藻（1875–1959）為晉北中路司令，12 月 22 日任命熊希齡為熱河都統，北洋力量進入蒙地，便於統一指揮。

內外蒙之間多為沙漠戈壁，不利軍隊馬匹補充，而錫盟北面是清朝皇家最大牧廠——達里岡愛。此地廣三百里、袤四百里，水草豐美，擁有馬駝羊群，利於駐屯，成為外蒙南下要衝。1912 年夏，此地總管索諾木多普丹等人逃往庫倫，[49]導致無人鎮守，庫倫當局委派剛從伊犁投奔外蒙的蘇米亞（1874–1935）占領達里岡愛，[50]由此外蒙獲得南下的基地。巴布扎布（1875–1916）、海山等來自內蒙的激進將領便屯兵於此，劍指錫盟。

錫盟共十旗，其中浩齊特左、右二旗札薩克在外蒙獨立之初便投奔而去，其餘八旗「決不致與喀爾喀表同情」，[51]錫盟盟長楊桑接受章嘉活佛等人宣傳的共和意義，傾心於民國。但章嘉此行惹怒庫倫當局，並遷怒於楊桑，[52]擔憂他接近北京政府，會妨礙外蒙控制錫盟各旗，[53]於是命令駐紮在達里岡愛的巴布扎布率軍進入錫盟阿巴嘎左旗王府，將楊桑

1002-332，無頁碼。

49 〈署理察哈爾都統兼署察哈爾副都統何宗蓮呈大總統遴委依達木札普接署達理崗崖馬駝群總管請鑒核施行文並批〉（1912 年 10 月 19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1 冊，頁 166。

50 詳見張臨希，〈達里岡愛歸屬變遷詳考〉，《清史研究》2025 年第 5 期，頁 165。

51 〈署理察哈爾都統何宗蓮等呈報事〉（1912 年 8 月 20 日），《國務院檔案》，典藏號：1002-332，無頁碼。

52 〈蒙藏事務局呈大總統請准昭烏達盟敖漢旗多羅貝勒德色賴托布駐京以示體恤文並批〉（1913 年 2 月 3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1 冊，頁 313。

53 詳見橘誠，〈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内モンゴル統合の試み〉，頁 73。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逮捕至庫倫。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912 年 11 月檔案顯示，「錫盟盟長阿不各王（註：阿巴嘎左旗郡王）及印信於上月念（註：廿）五夕均被庫倫來兵劫去，迫脅服從」，[54]由此可以確定外蒙軍隊此次深入內蒙的軍事行動發生在 10 月 25 日，當日可認作外蒙南下的起始。

庫倫當局握有盟長印信，指揮錫盟各旗支援蒙軍南下。錫盟地域廣闊，東接哲、昭二盟，南靠察哈爾，西連烏盟，占有此地可三面出擊。北京政府無法坐視錫盟被控，11 月袁世凱直接致電哲布尊丹巴質問：「貴喇嘛以兵力擾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達里崗崖一帶，致令人民慘受兵禍，王公或被擒擄……貴喇嘛何得以一隅之地，冒稱蒙古全國？」[55]但溝通無果，至此袁世凱確認武力衝突不可避免。12 月 15 日，袁世凱致電奉天都統張錫鑾（1843–1922），準備武力解決外蒙南進問題，提醒他早做準備，並特意叮囑其活佛與內蒙的聯絡網：「庫逆哲布尊丹巴以民國擬武力解決，特派黨匪多人，潛入東省一帶，希圖煽惑，並秘探我軍情形」，[56]要求密查，並命令東三省防範各要隘：「胡匪多有投入外蒙者……除電令奉、吉兩省外，特電江督，於省境接蒙各關隘、通衢，多派軍警扼守。」[57]蒙軍行蹤無常，只得先重點防禦。

12 月的一條情報改變了民國的策略，昭盟慰問員周正朝密報，官保扎布等人在外蒙幫助下，聚匪千餘名，欲再起事，但「該處草地並無糧米，日食牛羊，豈能耐久？一旦乏食，勢如餓虎還山」。[58]北京政府立即明白外蒙就地聚匪補給不足，由庫倫千里運輸不切實際，須靠劫掠維持。1913 年 1 月前線探知，外蒙在達里岡愛以東增設游格吉廟基地，已

54 「洮南府本局調查員胡文田等來電」（1912 年 11 月 25 日），〈蒙藏事務局呈報開魯戰事及錫盟急迫熱河胡匪擾亂治安等情形的文書〉（1912 年–1913 年），《國務院檔案》，典藏號：1002(2)-71，頁 17–18。

55 〈覆庫倫哲布尊丹巴書〉（1912 年 11 月），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1 卷，頁 145。

56 〈致奉天都督張錫鑾電〉（1912 年 12 月 15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1 卷，頁 217。

57 〈致黑龍江都督宋小濂電〉（1912 年 12 月 23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1 卷，頁 263。

58 周正朝，〈昭烏達盟紀略〉，收入《北部邊疆》第 2 卷，頁 2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集糧十餘萬石，「而內蒙各地尚有陸續運往該處者，絡繹不絕，且謂又有槍械、子彈數十萬儲存該處」。[59]北京政府立即部署，以禁糧限制蒙軍南下：在內蒙西部的綏遠，張紹曾禁止商人向北運糧，在內蒙中、東部的多倫、熱河，「二日間復扣留外蒙運糧駱駝二千餘」，[60]要隘防禦政策由此升級為封禁內蒙。

蒙軍被封禁政策暫時限制在錫盟，只得向烏珠穆沁旗索馬千匹，以備過冬，[61]類似劫掠在錫盟各處均有發生。庫倫當局應對物資短缺，加緊向南運糧調兵，並阻塞民國北上之路。1、2 月間，外蒙堵絕張家口—庫倫之間的三條大路，並由臺站大路行至塞爾烏蘇。臺站路比張庫商道偏西，利於運輸，外蒙軍占領臺站路交匯點塞爾烏蘇，顯然醞釀更大規模的南進行動。同時在河套西北的烏喇特旗北境，也可見到外蒙軍百餘營帳千餘人，各持軍械，「藉以防禦民國問罪之師」，[62]戰線沿內外蒙邊界全線鋪開。由此可見，外蒙將進攻路線由錫盟一路變為三路，自東向西依次為：由達里岡愛、游格吉廟至錫盟；沿臺站路塞爾烏蘇至烏盟；自烏喇特三旗至河套。

陶什陶在內蒙東部的哲里木盟很有影響力，北投外蒙後，任兵部副大臣。起初他並未獲哲布尊丹巴批准參與行動，[63]但不久即加入南下蒙軍。3 月 1 日情報稱他已帶兵 1,000 名向達里崗愛進發，另派 600 名尚未確定是向張家口或綏遠進發。[64]北京政府擔憂這些內蒙人在故地號召舊部，使內蒙之匪成為外蒙嚮導。但北京政府無法探知庫倫當局的主攻方

59 王傳炯，「謹將此次抵綏沿途探得消息並擬就條陳意見數則開呈鑒核」（1913 年 1 月），〈蒙藏事務局呈報錫盟各旗擁護共和政體及蒙匪擾亂情形等文書〉（1912 年 10 月–1913 年 12 月），《國務院檔案》，1002(2)-72，頁 340。

60 勹與，〈西盟遊記〉，收入《北部邊疆》第 1 卷，頁 247–248。

61 〈就防範蒙匪事致大總統、國務院、陸軍部、參謀部電〉（1913 年 2 月 27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42–43。

62 勹與，〈西盟遊記〉，頁 257。

63 橘誠，〈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内モンゴル統合の試み〉，頁 82。

64 〈就嚴防庫匪致朝陽姚知事等電〉（1913 年 3 月 1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向，因此在內蒙東部，熱河都統熊希齡將熱河全境劃為軍事區域，利於統一調度，以防不測。他判斷察哈爾方向有京張鐵路便於民國運兵，外蒙必然規避察哈爾而主攻熱河，但熱河各防軍分散駐紮，不成體系，且主客號令不一。熊希齡提出由駐多倫的傅良佐部撥馬隊移駐經棚、林西，奉軍吳俊陞（1863–1928）撥馬隊移駐開魯、綏東，以便在熱河北部建立屏障，並請中央速派將領坐鎮赤峰，並授以總司令官，[65]統領熱河防務，改變各部隊互不節制的態勢。3 月 12 日，毅軍米振標（1860–1928）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帶馬步炮隊駐赤峰，陳光遠（1873–1939）由天津帶來巡防兩營駐朝陽，熱河防守力量增厚。

內蒙西部也在布置，張紹曾決定分區防備，以包頭為西路司令區，派遣晉軍一師二旅旅長劉廷森赴包頭兼任馬炮全軍司令；[66]同時為防止綏遠城周圍的土默特兵暗通外蒙，下令將土默特步騎兩營調至歸化城強行繳械，遣散兵丁，防止內亂。[67]就此，北京政府軍形成梯次布防。

三、內蒙全面戰爭與北京政府抵抗

袁世凱在內蒙的積極布置，「刺激了博克多汗政權，最終決議向內蒙派軍」。[68]庫倫當局任命達木丁蘇隆為出兵內蒙的總指揮，[69]統率五路軍隊，在 1913 年 1 月大規模向內蒙進發。蒙古國家檔案館存檔顯示其具體方向為：

65 詳見〈條陳熱河籌防之策致大總統電〉（1913 年 3 月 3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57–60。

66 包頭市地方志辦公室等編，李曉秋點校，《包頭市志》，收入內蒙古圖書館等編，《內蒙古歷史文獻叢書》第 8 冊上（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9），頁 17。

67 哈斯，〈民國初期內蒙古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政局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5），頁 33。

68 橘誠，〈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内モンゴル統合の試み〉，頁 82。

69 藍美華，〈內蒙古與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頁 40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第一路——游古組爾廟（註：游格吉廟），協理齊米德策凌的部隊。

第二路——達里崗愛，海山公、巴布扎布長官的部隊。

第三路——兩蘇尼特，那遜拉布濟赫（註：那遜阿爾畢吉呼）公的部隊。

第四路——呼和浩特（註：綏遠城、歸化城），索特諾木道爾濟的部隊。

第五路——烏喇特三旗、黃河，竹特格勒圖（註：吉圖古勒圖）長官的部隊。

這些部隊的任務是從內蒙古地區驅逐中國軍隊。[70]

如周太平所述，達木丁蘇隆、陶什陶、海山、巴布扎布、烏泰等蒙軍中的內蒙將領，在進軍內蒙古的前期階段發揮了核心作用。[71]由五條線路可知，外蒙派軍進攻主要指向錫、烏二盟。橘誠認為這是因二盟各旗傾向外蒙，[72]但實際上這僅是戰爭之初的規劃。內外蒙古之間道路錯綜複雜，路線因季節、牧草多寡經常變動，加之各軍行軍重疊、分進合擊等原因，各地對戰線的紀錄混亂，民國難以釐清南下軍隊數量、方向。

袁世凱最初輕敵，認為南下蒙軍至多不過 1,000 至 2,000 人，自信以關內布防足可應付。[73]北京政府僅在沿邊各地分區防守，具體布置為：「東三省士兵防禦呼倫貝爾、海拉爾一帶；新疆、伊犁軍隊防禦阿爾泰烏梁海、科布多方面；熱河、多倫之軍防禦車臣汗部；綏遠、歸化城之軍防禦土謝圖汗部；陝西、甘肅之軍防禦札薩克圖汗部」，[74]未規定互相之間如何呼應。但外蒙軍進入內蒙後，立即吸收當地流寇，軍隊人數像滾雪球般擴大。1913 年 2 月，南下蒙軍已達數萬人規模，[75] 3 月 5 日

70 彭查格諾羅布，〈活佛政府為建立「大蒙古國」而進行的鬥爭〉，頁 44。

71 周太平，〈關於博克多汗軍隊 1913 年向內蒙古採取的軍事行動〉，頁 480–481。

72 橘誠，〈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内モンゴル統合の試み〉，頁 83。

73 〈86 號電〉，收入《辛亥時期袁世凱秘牘（靜嘉堂文庫藏檔）》，頁 727。

74 周太平，〈關於博克多汗軍隊 1913 年向內蒙古採取的軍事行動〉，頁 479–480。

75 〈致奉天都督張錫鑾電〉（1913 年 2 月 14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2 卷，頁 52。

臺灣人學國外期刊論文資料庫

庫倫當局又派兵 4,000 人，其中混有俄官、俄兵，[76]內外蒙邊界呈現處處有警的局面。慰問員周正朝探報庫倫當局的進攻方向，可能兵分四路，分別是：歸化城、張家口、游格吉喇嘛廟、呼倫貝爾。[77]其中呼倫貝爾地方政權已與庫倫聯絡，且為俄國所保護，按理不應是出兵方向，其他三路與外蒙檔案記載相似。4 月 4 日陸軍部探知蒙軍 3,000 人分兩路，駐白廟子軍準備由水泉進攻歸化，駐貝子廟軍準備由阿巴嘎旗進攻經棚。[78]

結合後續戰役發展可大致梳理，此時庫倫當局主要分為三路向內蒙進攻：（一）東路以游格吉廟為基地，進入錫盟東部，越大興安嶺攻擊熱河防區；（二）中路以達里岡愛為基地，進入錫盟中部，向南進攻多倫、察哈爾；（三）西路以塞爾烏蘇臺站路為補給，分為兩支，一分支攻蘇尼特、一分支攻烏喇特三公旗，鉗形夾擊綏遠。進攻蘇尼特，可使張庫商道和張庫官道（臺站路）連為一體，再由四子王旗經百靈廟，從北向南至綏遠；進攻烏喇特三公旗，則可拿下河套以北地區，再從五原、包頭順黃河從西向東至綏遠。且東、西均有內應：東路「賊勢浩大，各旗有協助者……有滋擾克什克騰旗者」；[79]西路原本駐守陰山北武川縣的土默特旗將領玉祿，「與庫匪力言歸綏無兵，如進攻，勢在必取」，[80]這些內應皆增加了庫倫當局南下的信心。

情報顯示，西路敵情陡增，3 月 28 日蒙軍 400–500 人出現在烏喇特中旗烏不浪廟，4 月 1 日已過大佘太，占據烏蘭腦包，「各處人心震驚，逃者無算」。[81]但首次大規模戰役發生在東路與中路的結合部，稱為「錫

76 〈就偽蒙軍南下事致朝陽等府縣電〉（1913 年 3 月 5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65。

77 詳見「昭烏達盟慰問員周正朝謹密呈」（1912 年 12 月），收入〈蒙藏事務局呈報錫盟各旗擁護共和政體及蒙匪擾亂情形等文書〉（1912 年 10 月–1913 年 12 月），《國務院檔案》，典藏號：1002(2)-72，頁 130–131。

78 〈陸軍部來電〉（1913 年 4 月 4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215。

79 胡太才，〈偵蒙記〉，頁 77。

80 陸軍第八十混成團編印，〈征蒙戰事詳記〉，收入《北部邊疆》第 2 卷，頁 127。

81 胡太才，〈偵蒙記〉，頁 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河戰役」：4 月 3 日駐多倫傅良佐、駐經棚毅軍進至錫盟錫林河，被從駐貝子廟蒙軍打敗，只得退守大王廟。「中國軍隊有 500 人傷亡和失蹤」，[82]蒙軍將搶得的快槍 170–180 支、機關槍 20 餘尊和各種貨物糧食一併運回庫倫。[83]貝子廟蒙軍原是外蒙來兵與流寇組合而成，因此次行動得手而受到庫倫當局武器資助，逐漸勢大，醞釀越過大興安嶺進攻熱河防區。[84]

錫盟與昭盟之間被大興安嶺阻隔，但有 7 處隘口相連，分別是白塔子、琥珀托、烏泥台、掏爾吐、我靡里、碧綠台、石門子，均距林西縣城數十里或百餘里。熊希齡即刻令駐林西縣陸軍前往該 7 處要地駐紮，並請察哈爾方面撥軍隊協同防守，與熱河駐軍形成掎角之勢。[85]蒙軍的俄國指揮官見此，改變越過大興安嶺東進熱河的計畫，北返烏珠穆沁旗以北約百里的班達格廟，擄掠牲畜補充資源，[86]隨後連續攻占附近的米僧廟、浩落圖廟。蒙軍在錫盟站穩，頗為後悔錫林河戰役獲勝後被俄人勸阻，未繼續南下，時時醞釀取道達里湖畔的大王廟進攻多倫，向中路發展。熊希齡就此建議，以林西一帶為毅軍防守區，開魯一帶為奉軍防守區，[87]可見此時各區軍隊仍獨立作戰，還未連為一體。5 月上旬，毅軍兩營採取積極行動，作為獨立作戰部隊，主動越出大興安嶺，深入錫盟烏珠穆沁駐紮，原駐林西軍隊移駐大興安嶺 7 處隘口，以為後援。[88]北

82 別洛夫，〈1912 年至 1913 年期間喀爾喀軍隊進犯內蒙古〉，頁 344。

83 詳見胡太才，〈偵蒙記〉，頁 83。

84 詳見〈陳內、外蒙匪勢之嚴重情形致大總統國務院參眾兩院黎副總統各省都督電〉（1913 年 7 月 13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91。

85 詳見〈為西烏珠穆沁旗駐兵方法事致大總統電〉（1913 年 4 月 4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211。

86 詳見〈報告林西匪情致大總統、國務院、陸參兩部電〉（1913 年 4 月 28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345。

87 〈陳熱河布防禦敵之計劃致大總統、陸參兩部電〉（1913 年 4 月 19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300。

88 〈就各軍布防事致林西奎團長電〉（1913 年 5 月 8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4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京政府對於外蒙問題「已決定取急進主義」，[89]調駐張家口的于有富混成旅赴大王廟、陳文運騎兵旅赴多倫，阻蒙軍從中路南下。熊希齡為前財政部長、理財能手，湊來熱河庫款 5,000 兩勞軍，一時間「主客各軍往來雲集，軍裝彈械亦先後運至」，[90]多倫、經棚援軍齊集，兵力充沛，蒙軍暫時不敢南下。

庫倫當局對內外蒙兵待遇不同，外蒙兵每月得山羊 3 隻、茶磚半塊，均為生活保障物資，而內蒙兵「月給十五金」，[91]卻無食物，只得劫掠當地，烏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之間有千餘名蒙軍向蒙民勒索牛羊。[92]庫倫當局緊急籌備，任命烏珠穆沁旗北的游格吉廟大喇嘛為該地都統，負責籌集糧械馬匹。除物資外，外蒙軍四處抓人充當兵力，喇嘛罕廟、糜珠廟等處「見年壯者，無論喇嘛，黑人（注：未出家為僧的蒙古人）即擄去」，[93]兵力發展為 4,000 至 5,000 人規模，且槍械優良。同時庫倫當局又遣人赴昭盟煽惑，一時間熱河防區各旗流寇活躍，與駐錫盟的蒙軍均有聯絡，[94]導致北京政府駐守大興安嶺前線各軍腹背受敵。深入錫盟的毅軍更加需要各軍配合，5 月 30 日袁世凱於是將熱河以北各軍全部劃歸米振標統領，以一事權。

蒙古騎兵善於馬戰，民國士兵往往一交戰，便被蒙古軍用套馬桿子掀下馬來，[95]成為俘虜。熊希齡提醒前敵部隊「宜重遠探」，[96]利用優勢

89 〈致電各省都督商討征蒙事項〉（1913 年 5 月 6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2 卷，頁 441。

90 周秋光，《熊希齡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 299。

91 胡太才，〈偵蒙記〉，頁 82。

92 詳見〈告知蒙匪情況致奉天、吉林、黑龍江等都督電〉（1913 年 5 月 12 日）、〈告知匪情致察哈爾何都統電〉（1913 年 5 月 15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446–447、464。

93 〈報告匪情致大總統、陸參兩部電〉（1913 年 5 月 24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518。

94 〈為剿匪事致多倫傅鎮守使電〉（1913 年 5 月 29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549。

95 金啟孮，《北京郊區的滿族》，頁 6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兵力主動尋找敵人。不久在林西縣西北的烏泊羅河戰役中，毅軍採取「馬隊分兩翼，步炮居中」的馬、步、炮騎協同的新戰術，[97]取得勝利。接下來的喇嘛罕廟戰役，蒙軍 1,500 人占據地利分為三股，引誘包抄相結合。米振標首先搶占山頭後，仍以馬步炮結合，向敵左翼猛轟。蒙軍的喇嘛罕廟營地被轟開，只得退回正北方的王子廟。米振標總結「炮隊甚形得力」，[98]盛讚以火炮對付騎兵的效果。

蒙古優勢是騎兵行軍迅速，一夜奔馳 140 里。[99]但騎兵也有缺陷：草原曠野不利於大軍駐紮，僅能利用寺廟房舍和倉庫屯兵，一旦丟失一個廟，即須往另一個廟聚集。民國軍隊就此發現，只要逐一拔除寺廟，蒙軍就無依託。6 月中旬「跳廟作戰」開始實施，米振標等軍於 26 日攻克他他廟，繼而連續收復喇嘛罕廟、浩落圖廟、王子廟、米僧廟。米僧廟距什巴爾台 60 里，東至浩落圖廟不滿 50 里，浩落圖廟東北 60 里即烏珠穆沁旗王府、西南 60 里至烏泊羅河、正北至喇嘛罕廟不足 100 里、西北至他他廟 70 里，喇嘛罕廟之西 12 里即王子廟。米軍占領這些寺廟，即標誌進入西烏珠穆沁旗，隨即將王子廟、他他廟付之一炬，只留下米僧廟以備駐軍。[100] 7 月 6 日熊希齡又送到子彈 251,000 發、炮彈百粒，[101]自此民國軍隊武器充裕後，初步控制錫盟東南部。熊希齡總結：

> 希齡初到任時，熱河軍務複雜，主客各軍不復統一，危險萬分，屢奉鈞示，逐漸佈置，稍有頭緒，各客軍將領感情亦皆浹洽，凡有徵

96 〈告知已匯款交貴軍使用致林西米統領電〉（1913 年 6 月 1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574。

97 〈經棚米統領來電〉（1913 年 6 月 27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714。

98 詳見〈轉米統領報捷電致大總統陸參兩部電〉（1913 年 7 月 1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2。

99 莫理循，〈致蔡廷幹函〉（1913 年 5 月 27 日），收入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以下簡稱《莫理循書信集》並省略編譯者），頁 160。

100 詳見〈為派兵留駐米僧廟事致林西米統領電〉（1913 年 7 月 8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49–50。

101 〈赤峰葉知中蔣局長來電〉（1913 年 7 月 6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4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調，均無阻力。[102]

東路形勢逐漸恢復後，熊氏於 7 月 31 日升任國務總理，離開熱河。

內蒙西路戰事仍趨膠著。前文已述，蒙軍在西路兵分兩支，左右夾擊綏遠。左支要衝滂江位於張庫商道、綏庫大路之間，占據此地，可向三個方向南下：百靈廟—綏遠、豐鎮—大同、鑲黃旗—張家口。5 月 22 日防守該地的馬隊第二營營長謝樹棠作戰失利，後退至距豐鎮縣境 30 餘里的紅村，[103]造成滂江失守。6 月 2 日歸化城混成旅劉虎臣救援失利，官兵敗逃，[104]蒙軍順勢進至西路戰略要地百靈廟，與綏遠城隔陰山相望，「厲兵秣馬，乘勢南進，欲遂掠歸、綏二城之野心」。[105]一時間，左近的四子王旗、喀爾喀右翼旗皆成為蒙軍的物資供應站。綏遠將軍張紹曾命令駐陶林的旅長孟效曾赴滂江、陸軍第八十混成團進攻百靈廟。隨後，孟效曾收復西蘇尼特王府、滂江等處，[106]八十團於 7 月 10 日收復百靈廟，[107]西路威脅減輕。

最大收穫來自西路的右支。因河套以北的烏喇特三公旗與外蒙相接處皆為戈壁，難以行軍，但此地擁有反抗既存統治的民眾基礎：清末以來，朝廷放墾政策和各旗王公債務攤派，造成內蒙西部大量牧民流離失所，他們被迫秘密結成諸多「獨貴龍」組織，抗擊暴政，具有反貴族、反洋教性質。民國初年，該組織在伊克昭盟各旗壯大，其中札薩克旗活佛旺丹尼瑪（時稱「王德呢嗎」，1872–1926）領導的「獨貴龍」更發展為武裝團體，在西二盟聲望極高。外蒙發揮內蒙喇嘛作用，委任旺丹尼瑪為此地統帥，內蒙西部意志隨之轉移，一時間烏喇特三公旗依附

102 〈就推遲入都事致大總統電〉（1913 年 7 月 2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8。

103 〈致歸化張將軍梗電〉（1913 年 5 月 23 日），收入盧明輝編，《巴布扎布史料選編》（呼和浩特：中國蒙古史學會，1979；以下省略編者），頁 95。

104 胡太才，〈偵蒙記〉，頁 88。

105 陸軍第八十混成團編印，〈征蒙戰事詳記〉，頁 102。

106 〈臨時大總統令〉（1913 年 7 月 3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1 冊，頁 434。

107 詳見陸軍第八十混成團編印，〈征蒙戰事詳記〉，頁 12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最多，[108]「蒙匪停住烏布洛各廟，日前該匪入（河）套，即系該喇嘛嚮導」。[109]他在黃河河套北部聚眾數千，攻陷大佘太，脅迫各旗出兵進攻內蒙西部重鎮包頭。[110]駐包頭晉軍劉廷森抵擋不住，放棄河套以北的狼山。閻錫山派晉軍孔庚換防，[111]但仍無法抵擋，5 月五原全境陷落。政府急調駐寧夏的甘軍馬福祥（1876–1932）助戰，馬福祥攜子馬鴻逵（1892–1970）、侄馬鴻賓（1884–1960）赴河套北部。6–7 月甘軍與晉軍聯合，先後剿平台梁、大佘太等處，進而用計擒獲旺丹尼瑪。據馬鴻逵本人回憶，是他在嚴冬窮追 1,000 餘里將之生擒，[112]但此回憶有誤，馬福祥戰報記載 1913 年 7 月：

> 突聞王德呢嗎親統大軍直窺後套……（馬福祥）等人偽稱心向庫倫，無緣接洽……並著善詞慫恿招誘王德呢嗎等來船密商……該匪竟入彀中，得令萬險孤軍猝擒巨憨。[113]

另據親歷者口述，是馬福祥通過阿拉善王的總管安久與旺丹尼瑪接洽，假意投奔，雙方在黃河船中會晤，將其智擒。[114]馬鴻賓聽聞得手後，立即在河套以北進擊，肅清狼山一帶。至此，庫倫當局南下的三路四支，東路被熊希齡限制在錫盟，西路右支隨著旺丹尼瑪被擒，河套戰事基本結束，只剩下中路尚有威力，形勢開始有利於北京政府。1913 年上半年南段（內蒙戰線）進攻形勢如圖一。

---

108 胡太才，〈偵蒙記〉，頁 90。

109 胡太才，〈偵蒙記〉，頁 77。

110 〈臨時大總統令〉（1913 年 7 月 11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1 冊，頁 447。

111 〈復北京大總統六月三日防剿蒙匪電〉（1913 年 5 月 31 日），收入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伯川先生要電錄》（臺北：閻伯川先生紀念會，1996；以下省略編者），頁 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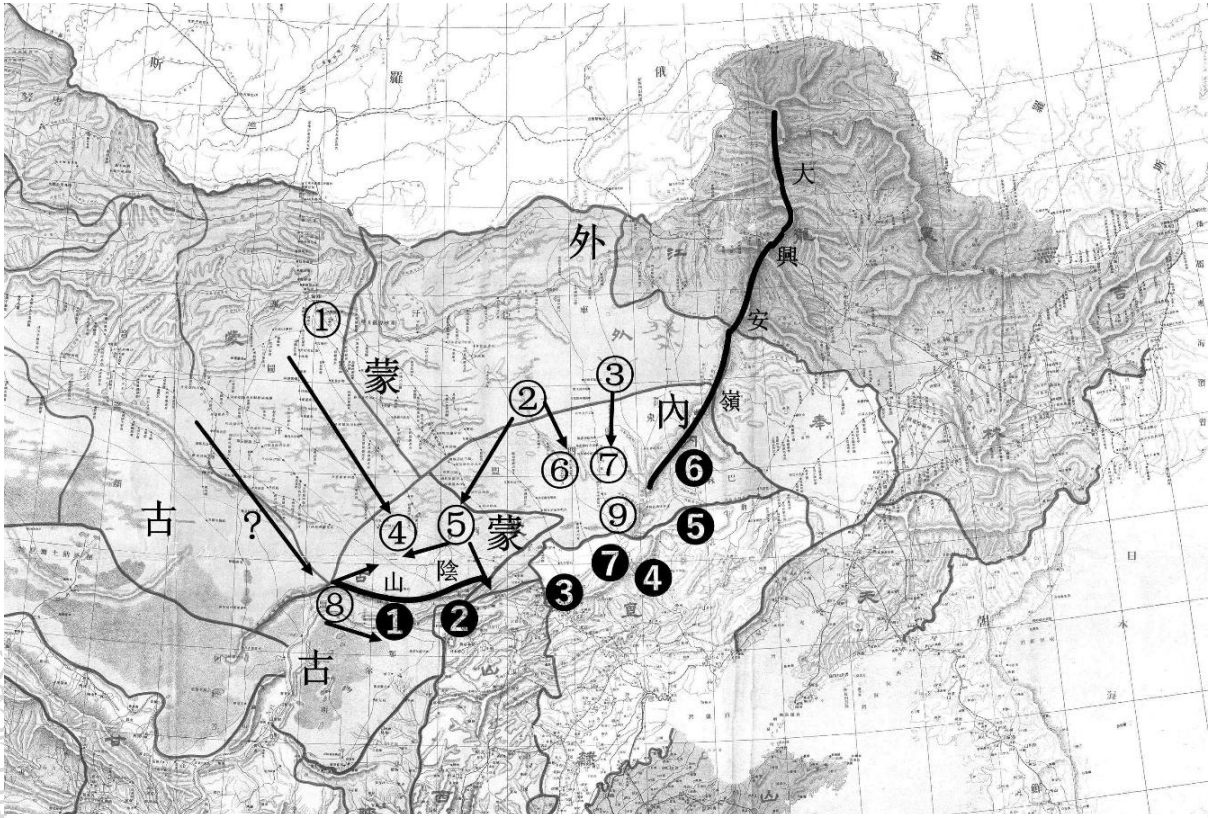
112 詳見馬鴻逵，《馬少雲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公司，1994），頁 40。

113 〈阿爾泰護軍使馬福祥呈大總統遵查擒獲王德呢嗎一案異常出力各員並傷亡弁勇繕具清單請鑒核施行文並批〉（1913 年 9 月 5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1 冊，頁 480。

114 詳見章藏珍口述，〈施用巧計智擒「活佛」〉，收入文斐編，《我所知道的馬鴻逵家族》（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頁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一　1913 年上半年庫倫當局南下內蒙形勢示意

說　　明：庫倫當局進攻方向如箭頭所示，其占有要地或進攻目標為：①庫倫②達里岡愛③游格吉廟④百靈廟⑤滂江⑥阿巴嘎左旗⑦貝子廟⑧五原⑨大王廟。

北京政府兵力集結地：❶包頭 ❷綏遠 ❸張家口 ❹赤峰 ❺經棚 ❻林西 ❼多倫

資料來源：〈中國全圖〉（局部），收入陳鎬基編，《中國新輿圖》（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無頁碼。

四、二次革命與南下、西進終結

正當外蒙南下受挫之時，南方二次革命爆發，北京政府面臨南北雙線壓力，原計劃調往內蒙的兩淮米占元部隊因防備南方，無法北運，熊希齡籌劃的炮隊也只得擱置，兵源、武器同時遇到困難。庫倫當局見機不可失，立即進行新一輪動員，7 月向內蒙各地發出呼籲書，稱將再派大軍趕走民國軍隊，鼓動內蒙共同對抗民國政府。[115]不久各地傳聞：「內蒙人民如能捐助庫倫至千金以上者，由庫倫政府予以各部司官。如能聚集百人以上投往庫倫者，予以管帶。」[116]給依附者政治許諾，吸引更多未被納入民國體系者加入。動員再次奏效，使庫倫當局得以重新擬定進攻方向：

> 擬定為貝子齊木德策林、公奈丹扎布所部軍需供給地為兩烏珠穆沁、浩齊特等四旗。輔國公蘇米雅所部軍需供給地為阿巴嘎大王及三阿巴哈納爾等四旗。貝勒那遜阿爾畢吉呼所部軍需供給地為伊克昭盟、烏蘭察布兩盟之三公旗、茂明安等四旗，以上諸旗務須為各路軍備辦各項所需物品。[117]

當局劃出內蒙各旗提供軍需範圍，以便從錫盟、烏盟再次突破。袁世凱宣布革去之前投靠外蒙的東、西浩齊特兩旗王爵，以示懲罰。但 7 月後，北京政府面臨兩線作戰，前線連連失利：那遜阿爾畢吉呼（?–1918）再次占領滂江，威脅西路的綏遠，中路門戶大王廟亦於 13 日失守。

大王廟位於克什克騰旗西北，原歸于有富混成旅一團負責防守，該團「由大王廟克里更退守經棚……節節挫敗，自是將不得力」。[118]蒙軍

115 別洛夫，〈1912 年至 1913 年期間喀爾喀軍隊進犯內蒙古〉，頁 345。

116 〈電令奉天都督張錫鑾飭禁內蒙謠傳〉（1913 年 8 月 27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3 卷，頁 388。

117 哈斯，〈民國初期內蒙古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政局研究〉，頁 37。

118 〈致多倫傅鎮守使刪電〉（1913 年 7 月 15 日），收入《巴布扎布史料選編》，頁 9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占有此地後，可繞開大興安嶺防線，或向南直攻多倫，或向東進攻經棚，進而從大興安嶺隘口進攻東路的林西。8 月初，蒙軍從大王廟南下，攻陷正藍旗。[119]外蒙趁軍事推進順利，再次調整主攻方向：「那遜阿爾畢吉呼、穆榮嘎等捍衛自蘇尼特旗至察哈爾各旗群及張家口之腹地」，[120]即令蒙軍向中路合併，意在奪取多倫。多倫是康熙朝漠北諸部初歸清朝時的會盟所在地，且為歷世章嘉活佛駐地，一世、二世哲布尊丹巴也曾在此躲避準噶爾汗國進攻，雖然在行政區劃上歸直隸管轄，但仍是內蒙古的宗教中心，對蒙古影響力巨大。在交通上，多倫連接察哈爾、熱河、錫林郭勒盟，是中路的核心城鎮。大王廟、正藍旗陷落後，多倫西北部頓失保護。袁世凱震怒，以該區「駐守將領等喪失要地，委棄軍械糧餉，盡以資敵……此項軍隊甚不得力」為由，裁汰敗逃者。[121]新任多倫鎮守使王懷慶（1876–1953）整頓軍隊，終於在 8 月下旬克復正藍旗、正白旗。[122]

南方二次革命旋興旋滅，北京政府很快又能夠全力應付北方。蒙軍經過數月準備，中路實力雄厚，也決意放手一搏，就此蒙軍南下以來最大會戰在多倫外圍爆發：8 月末兩軍大戰於哈噶塔拉，蒙軍集結 5,000 餘名士兵分踞山頭，北京政府淮軍縱隊司令李際春（1877–?）帶隊，與褚思榮、騎兵總隊司令陳文運（1888–?）輪番力戰，終使「匪軍傷亡過半，餘匪往大王廟方向逃竄」。[123] 9 月 2 日，蒙軍 800 名繞到北京政府軍背後準備襲擊，次日晨被打退。至此，蒙軍在多倫外圍戰役均吞敗。9 月北京政府向北增兵，調原駐守河南的王汝賢（1874–1944）率兩混成旅

119 詳見軍事科學院編，《中國近代戰爭史》第 3 冊，頁 314。

120 哈斯，〈民國初期內蒙古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政局研究〉，頁 37。

121 〈懲治大王廟之役失利相關人員令〉（1913 年 8 月 11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3 卷，頁 294。

122 〈臨時大總統令〉（1913 年 8 月 26 日），收入《政府公報》第 1 冊，頁 476。

123 〈獎恤王懷慶等剿蒙匪獲勝出力人員令〉（1913 年 9 月 10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3 卷，頁 4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赴多倫。蒙軍繼續猛攻此地未果，向後退卻。

外蒙南下不順，內部權力關係也隨之變化。之前擔任副總理的內蒙賓圖王棍楚克蘇隆（1887–1913）據傳遭投毒，1913 年 6 月暴斃，內蒙外附諸將為之震撼，也使政府核心人物失和：

> 陶什陶狡詐奸險，有自霸外蒙之心……偽政府有權者為達親喇嘛（註：車林齊密特）及海松公（註：海山），而兩人互相猜忌，故如一盤散沙。[124]

北京政府看到機會，秘密招撫內蒙外附者。9 月，海山通過長子海永溥與北京政府商談歸附；[125]與賓圖王關係親密的那遜阿爾畢吉呼，經袁世凱的瑞典顧問拉爾森（時稱「藍理訓」，Frans August Larson, 1870–1957）勸說後，帶領屬下赴北京接受冊封，成為「第一個返回中國的蒙古顯要人物」。[126]他親選的 200 名蒙古精兵，立即為北京政府所用。[127]那遜阿爾畢吉呼所率蒙軍是中路主力之一，原駐紮於蘇尼特兩旗，負責進攻察哈爾各旗牧群，9 月轉向多倫湖地區作戰，威脅張家口之腹地，他接受招撫後，中路形勢頓時好轉。

蒙軍在中路只剩多倫北部的大王廟、西北部的昭蘇乃木和奎蘇等幾個據點，被迫調整戰略。巴布扎布將主攻方向由南下多倫轉向東路，乘經棚空虛時率隊攻擊。[128]經棚為內蒙戰線東路與中路結合部，背靠大興安嶺隘口，地處察哈爾、昭盟、錫盟交界，為軍糧存放之地，卻無守軍。9 月 18 日巴布扎布軍占領此地，立即使各處蒙軍連為一體，向東路的林

124 胡太才，〈偵蒙記〉，頁 94。

125 詳見樊明方，《中國北部邊疆史若干問題研究》（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頁 277。

126 莫理循，〈關於在河南省使用蒙古馬隊的備忘錄〉（1914 年 1 月 24 日），收入《莫理循書信集》下卷，頁 299。

127 詳見拉爾森（藍理訓，Frans August Larson）著，張建軍譯，《蒙古公爵拉爾森（藍理訓）：一位瑞典傳教士的回憶》（臺北：民國文化學社，2023），頁 226–233。

128 彭祝三整理稿，〈巴布扎布與毅軍米振標之戰爭〉，收入《巴布扎布史料選編》，頁 38。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西縣三面聚集，[129]將戰火引向東路。北京政府立即調遣奉軍吳俊陞兩團赴林西，王懷慶一旅援多倫，兩面壓迫經棚蒙軍，這是察哈爾部隊與奉軍首次聯合進剿。10 月 1 日吳俊陞率 2,000 人進攻，巴布扎布在敖包山開炮，並利用馬隊分左右兩翼包夾，密集衝擊。激戰兩、三日，雙方各有傷亡，奉軍退至經棚東大壩梁。

經棚附近集結了陸軍第一師、毅軍、奉軍等多區域兵團，北京政府為了協調聯合作戰，10 月 5 日任命姜桂題（1844–1922）為熱河都統兼督辦熱河北部防務，再次統一前線指揮權。國務總理熊希齡親自督促供應，令毅軍由錦州朝陽解五萬元赴赤峰。[130] 28 日，熱河毅軍張殿如率馬隊三營、步隊兩營、炮隊兩營支援奉軍，與吳俊陞聯合從林西進攻經棚，毅軍沿用烏泊羅河戰役時摸索出的騎步炮協同戰術，選好陣地連續發射，巴布扎布軍傷亡七、八十人，寡不敵眾，遂撤出經棚。[131]各軍在大壺樑、哈達山口、新廟各地方節節前進，於 29 日下午克復經棚。[132]隨後，米振標出任經棚、林西鎮守使，將兩處防務統一。他與吳俊陞等形成三路進攻，繼續「跳廟作戰」，11 月相繼克復駱駝廟、大王廟，同時，王汝賢部出多倫，收復昭蘇乃木、奎蘇。至此察哈爾、昭盟全境復歸民國政府掌控，中路蒙軍退至錫盟。1913 年下半年南段（內蒙戰線）爭奪要地如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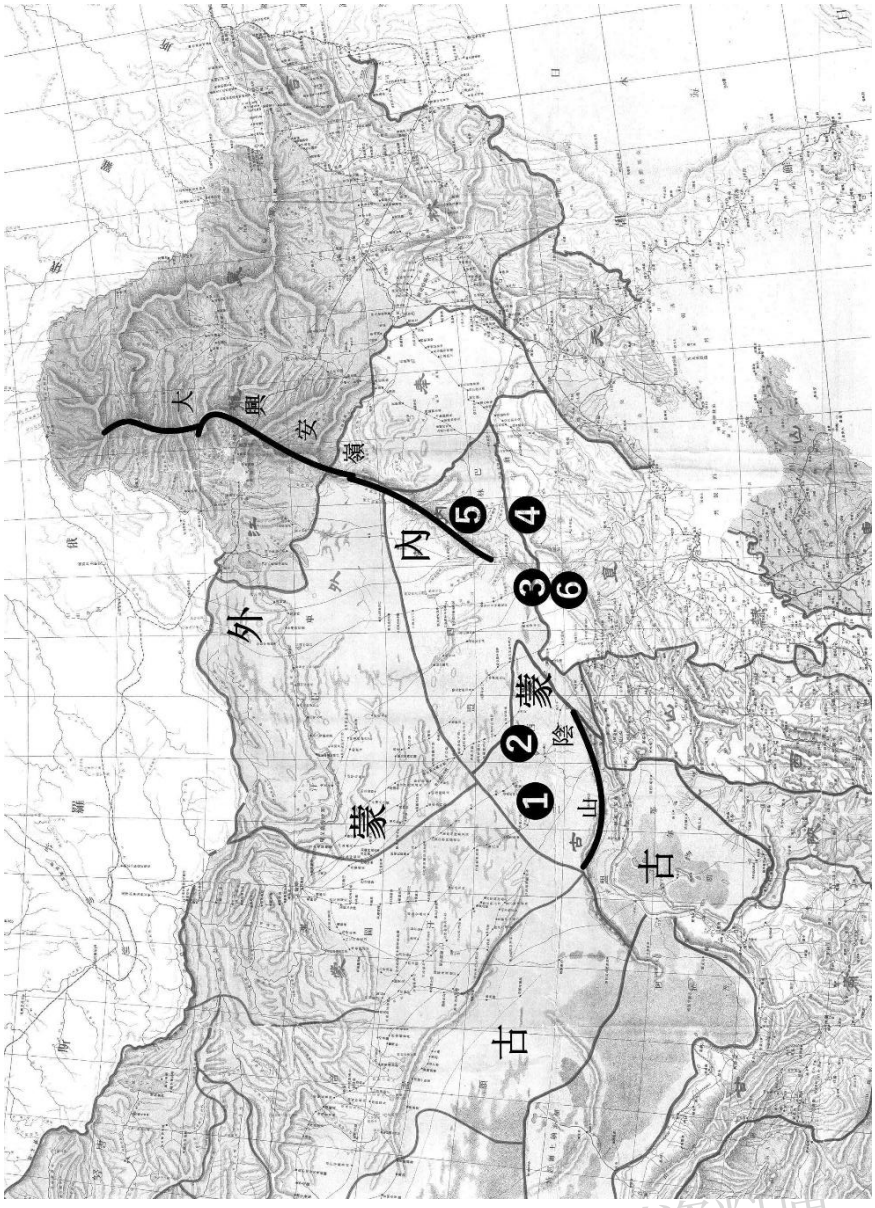
129 詳見藍美華，〈內蒙古與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頁 400。

130 〈就林西軍事安排及糧秣供應事致赤峰葉知事蔣局長電〉（1913 年 9 月），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308。

131 彭祝三整理稿，〈巴布扎布與毅軍米振標之戰爭〉，頁 39。

132 〈獎敘克復經棚有功人員令〉（1913 年 11 月 7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4 卷，頁 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二　1913 年下半年庫倫當局與北京政府在內蒙奪要地示意

說　明：❶百靈廟 ❷滂江 ❸大王廟 ❹經棚 ❺林西 ❻多倫

資料來源：〈中國全圖〉（局部），收入陳錦基編，《中國新輿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庫倫當局也趁二次革命之機，再次經營西路，8 月中旬蒙軍 1,100 餘人將「與革命黨（註：指北京政府軍）聯合之蒙民全行殺害」。[133]烏喇特三公旗亦見 3,000 餘名蒙軍搶劫牲畜，但其西路鉗形的右支已在 7 月被馬福祥翦斷，始終不見與民國軍隊正面交鋒，研判已退化為流寇，不構成威脅。蒙軍只有左支滂江一百靈廟可用，此地戈壁較多，補給問題需由烏盟王公解決。但當民國陸軍第八十混成團移駐可可以力更、百靈廟，控制喀爾喀右翼旗，烏盟對蒙軍的幫助急速減少。11 月庫倫當局進行最後努力，由玉祿（1874–1925）引領再次進攻百靈廟，但很快被八十團擊退。蒙軍最大問題是補給，前期戰役在俄國暗助下雖獲武器保障，但隨中俄談判結束，俄國的供應越來越少。11 月 10 日，俄國透露蒙軍「已經沒有子彈了，他們既未嘩變，也未歸附中國人」。[134]蒙軍南下勢頭基本被遏制，僅餘殘部滯留在錫盟。

南段戰事大局已定，在與外蒙對峙的西段，也經歷了近一年的戰事。1912 年庫倫當局自科布多西進阿爾泰，秋冬時節新疆督軍楊增新（1864–1928）屯兵於科、阿、新三地孔道——察罕通古，阿爾泰長官帕勒塔也由承化寺出兵至布爾根河，距科布多不遠。此時庫倫當局在西段防備空虛，恰好阿爾泰山北大雪，成為北路天然阻隔，兩軍有機會從南路經察罕通古收復科布多。楊增新、帕勒塔要求進兵，但阿爾泰毗連俄國，袁世凱不敢刺激俄國，電令帕勒塔：「俄蒙立約協助，攻蒙即同攻俄。必須審慎。現由外交部爭執交涉，不可先進兵。」[135]北京政府因此未能進取，錯失收復科布多的機會。

1913 年春，庫倫當局在南下內蒙的同時，繼續科布多方向的西進行動，兵分兩路攻向阿爾泰。北路蒙軍由俄國籍「黑喇嘛」丹必占燦率領，進攻阿爾泰烏梁海。丹必占燦被庫倫當局任命為「鎮守西方將軍大臣」，

133 陸軍第八十混成團編印，〈征蒙戰事詳記〉，頁 133。

134 〈駐蒙古外交代表密電〉（1913 年 11 月 10 日），收入《俄書》，頁 194。

135 〈批阿爾泰辦事長官和碩親王帕勒塔初六日電〉，收入《辛亥時期袁世凱秘牘（靜嘉堂文庫藏檔）》，頁 7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烏梁海各地張貼哲布尊丹巴「旨意」:「阿山帕勒塔頑梗不化,可否剿除」,煽動各旗脫離帕勒塔管轄。之前因袁世凱的禁令,阿爾泰軍隊已撤回,帕勒塔為應對新局面再次出兵,駐布爾根河,在南路與察罕通古的新疆駐軍呈掎角之勢。但兩路軍隊因補給問題,均僅能沿臺站進軍,行動受限。楊增新從戰略角度分析,認為庫倫占據科布多城,則威脅阿爾泰所屬各部落,[136]建議先奪回北路阿爾泰烏梁海,形成對科布多南北的優勢。但俄國嚴防新疆軍隊北進,駐京公使和駐迪化領事先後威脅:

> 中國軍隊萬不可逾越阿爾泰山之北,如果貴國軍隊調到薩克賽,我國自有對付的辦法,其阿爾泰及沙拉蘇美(即承化)等處,難免我國不發軍隊佔據。[137]

北京政府再次屈服於俄國恫嚇,4 月 8 日袁世凱命令帕勒塔:「現正與俄商訂條約,所有阿爾泰山以北烏(梁海)、哈(薩克)地段,華俄雙方均不派兵前往,亦不令庫匪西趨。」[138]於是兩路軍隊不能越過阿爾泰山,只能停在布爾根河、察罕通古防守。春夏之季,北路蒙軍占據阿爾泰山東北側的阿爾泰烏梁海,南路蒙軍數次嘗試進攻察罕通古,遭到新疆駐軍頑強抵抗。楊增新力保鎮西—元湖—察罕通古的運輸線路,以維持局面,使兩軍對峙於此。1913 年西段攻防見第五節圖三。

五、停戰協約與軍事分界形成

1913 年 10 月,在俄國所謂的調停下,阿爾泰長官帕勒塔與庫倫當局達成停戰《臨時條款草約》,以各軍實際占領地劃定阿爾泰與科布多之間的停戰線。《草約》第二條規定:

136 詳見李毓澍,〈科阿分界研究〉,頁 142–143。

137 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 234。

138 〈(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致新疆都督楊增新)第二電〉(1913 年 4 月 13 日),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中華民國六年至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9;以下省略編者),頁 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中俄協約未經成立以前，阿爾泰與科布多疆界，暫以阿爾泰山最高分水嶺為界。但自江個什阿噶什起以布爾根河為界，至濟爾噶朗河口。即濟爾噶朗入布爾根河之處。再向東南，經陶甘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為界線。[139]

即在中俄就外蒙問題正式達成協約前，北京政府與庫倫當局在西段的軍事分界線大約以阿爾泰山分水嶺—布爾根河為界。清末「科阿分治」（1904），從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兩地拆析拼合出阿爾泰行政區，規定了兩行政區各自所轄部落，其中阿爾泰管轄「新土爾扈特二旗、霍碩特（註：新和碩特）一旗、阿爾泰烏梁海七旗、布倫托海屯田及哈薩克之一部」，[140]兩行政區即以各部落完整地域邊緣組成的習慣線為界。[141]阿爾泰所轄阿爾泰烏梁海、新和碩特、新土爾扈特三部，分別跨阿爾泰山、布爾根河兩側游牧。此軍事分界線將三部從中切開，清朝以部落地域為邊的王朝天下傳統，遭遇現代國際法理界線的挑戰。此外，新疆軍隊控制的察罕通古位於科布多所轄扎哈沁部，因此軍事分界線與實際控制地並不完全重合，仍待釐清。《草約》具有臨時性質，「俟中俄協約成立之日失其效力」，[142]即等待中俄正式議定停戰線位置。阿爾泰與外蒙一側的界線安危，全等中俄談判一錘定音。

此處需簡要回顧中俄談判進程。陸徵祥與俄使庫朋斯齊在北京進行的「陸庫會議」，已於 1912 年 11 月 30 日開始，前後磋商 30 餘次，並未取得實質結果。1913 年 5 月 8 日，北京政府為扭轉內蒙局勢，屈服於俄國要挾，議定草約六條，承認俄國在外蒙的獨特地位和利益。但國會在審議草約第五條附條時，要求修改其中「蒙古中央長官」字樣，並限定蒙古為「外蒙古」，俄方認為中方「是想將蒙古恢復到昔日各部分散

139 李毓澍，〈科阿分界研究〉，頁 148。

140 科布多辦事大臣錫恆，〈為會奏遵擬科阿劃疆分治等因一摺理藩部會同度支部議奏奉旨相應粘抄原奏摺稿並恭錄諭旨咨行事致陸軍部〉（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兵部－陸軍部南京移交》（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典藏號：15-01-001-000046-0086。

141 詳見徐建平，〈清中期以來阿爾泰山地區分界研究〉，頁 56–67。

142 李毓澍，〈科阿分界研究〉，頁 14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狀態，並取消呼圖克圖（註：哲布尊丹巴）與內閣統一之政權」。[143] 7 月 11 日，民國參議院否決草約。13 日，庫朋斯齊將俄國照會面交陸徵祥，宣稱停止談判。二次革命結束後，孫寶琦（1867–1931）接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與庫朋斯齊重開會談。10 月阿爾泰—科布多方面暫時達成停戰草約，俄方看到庫倫當局無力占領內蒙，同意將協約中「蒙人權利」一語限定為「外蒙」字樣，即不改變內蒙的性質，縮小庫倫當局權力範圍。雙方決定以公布聲明、互換公文方式締約，而不用協約形式，以繞開國會批准環節，避免再度被否決。

11 月 5 日袁世凱解散國民黨，令國會停頓，同日發布《中俄聲明》和〈聲明另件〉，言明民國對外蒙擁有宗主權，外蒙保留自治權，承認俄國在外蒙各項利益。其中對北部邊界最重要的是〈聲明另件〉第四款限定了外蒙具體範圍，即「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轄之境為限」，承認庫倫當局占領科布多，默認外蒙從傳統的喀爾喀四部擴展至科布多，使內—外蒙各旗界、阿爾泰—科布多界由地方屬性上升為自治與非自治區的政治分界。

聲明發布後，北京政府不再擔憂俄國染指內蒙，要求俄國「鄭重勸告蒙古政府停止在內蒙古之軍事行動」。[144]俄國鑒於已經達到將外蒙古地位特殊化的目的，為維護談判成果，答應繼續勸阻庫倫當局。[145] 10 日，俄駐蒙古外交代表密勒爾（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ич Миллер, 1868–1940）對庫倫當局申明：「撤回喀爾喀邊境愈早，停止軍事行動愈早，則對內蒙古人及庫倫政府愈有利。」[146]哲布尊丹巴隨後下令土謝圖汗部等處南下的軍隊停止行動，密勒爾擔心軍隊不遵從召回，再派遣信使反覆督促。就此，庫倫當局「耗盡財力及國力之軍事行動已告結束」。[147] 隨著蒙軍北撤，11 月下旬北京政府先後克復駱駝廟、大王廟，12 月收復

143 詳見樊明方，《中國北部邊疆史若干問題研究》，頁 334。

144 〈代理外交大臣致駐蒙古外交代表密電〉（1913 年 11 月 10 日），收入《俄書》，頁 191。

145 詳見〈代理外交大臣致駐北京公使密電〉（1913 年 11 月 10 日），收入《俄書》，頁 192。

146 〈駐蒙古外交代表密電〉（1913 年 11 月 10 日），收入《俄書》，頁 193。

147 〈駐蒙古外交代表密電〉（1913 年 11 月 20 日），收入《俄書》，頁 20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整個錫盟。

庫倫當局內部並不服從結果，土謝圖汗仍希望軍隊向內蒙推進，總理那木囊蘇倫率使團赴聖彼得堡商討庫倫當局在內蒙的統治前途，堅持「所有已經聯合起來的蒙古人都包括在內的辦法來確定蒙古國家的疆界」，[148]仍然將合併內蒙作為外交政策中心。但俄國不支持外蒙過度擴張，更擔憂釀成日本插手，將使內蒙局勢不利於己，因為「日本人在耍花招，趁一切有利機會使中國人相信，我國處處與中國為敵，中國唯一之出路是與日本親善」。[149]俄國就此努力撇清自己與戰爭的關係，外交副大臣為俄軍事人員曾協助蒙軍而辯解：「據我們所知，蒙軍中確有一些俄國冒險主義者，他們自己做事自己負責。」[150]

在俄國和庫倫當局退卻之時，北京政府卻無心無力趁勢北上收復外蒙，袁世凱仍顧慮「伐蒙即攻俄」，不敢北越內外蒙界挑戰俄國勢力。1913 年 12 月 9 日，袁世凱召開總統府軍事會議，對庫倫當局做出決定性溝通：

> 現中俄協約業已締結，擬請外蒙活佛酌派蒙軍，在內外蒙交界處重設砲卡，防其逃竄。函知內外各盟長，迅速挑選壯丁，在本盟要隘截堵。[151]

這條密令，實際上承認了北京政府與庫倫當局在外蒙南側以內、外蒙旗界為軍事分界線，彼此力量基本不再跨越，[152]成為國家默認的政治習慣。

隨著中俄談判塵埃落定，西段的阿爾泰與科布多停戰草約轉向正式約定。1913 年 12 月 21 日，帕勒塔與庫倫當局代表簽署《臨時停戰條款》

148 蘇聯科學院等編，巴根等譯，《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 224。

149 〈駐北京公使密電〉（1913 年 11 月 15 日），收入《俄書》，頁 197。

150 〈外交副大臣致蒙古外交代表密電〉（1913 年 12 月 9 日），收入《俄書》，頁 215。

151 〈密交國務總理熊希齡各部長綏遠將軍張紹曾殷貴總統府顧問畢桂芳宋小濂等在總統府會議蒙邊軍事〉（1913 年 12 月 9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4 卷，頁 402。

152 1916 年北京政府的軍隊為追擊巴布扎布，曾短暫越界至游格吉廟；1919 年徐樹錚（1880–1925）也曾短暫出兵外蒙古，但最終並未達到目標，此後中國再無越界向北的軍事行動。

臺灣大學圖書館

三條，再次確認兩地軍事分界線「自奎屯山（註：即現中蒙國界西段起點）起，東至江噶什阿喀什，順布勒根河至吉爾格朗河口，再東南經察罕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為界」，[153]即仍以阿爾泰山分水嶺—布爾根河為界，協議有效期定為 8 個月。1913 年末，北京政府確認「現在時局粗定，外蒙退兵」，[154]發通告安撫受戰爭影響的蒙民。就此，席捲北疆的「丑年之亂」正式平息，北京政府管轄地域與外蒙南段、西段形成軍事分界線。

停戰線的確立，一方面確認庫倫西進、南下行動終結，另一方面卻將西段分界問題推向前臺。歷史上，各部界線模糊，無詳細精密蒙古地圖以供釐清，因此需要再次談判確定「外蒙古之準確疆界以及科布多與阿爾泰之間的邊界劃分」。[155]俄國不以清末「科阿分治」舊案所定各部落歸屬，而以阿爾泰山分水嶺為界，不允許中國軍隊越過，圖謀「把阿爾泰山所屬阿爾泰山以北、布爾根河以東地區及居民劃歸庫倫傀儡政府管轄」，[156]這是停戰線的癥結所在。《停戰條款》規定有效期為 8 個月，阿爾泰長官希望北京政府在期滿後交涉取消此線，避免在軍政、人民駐牧方面繼續受外力干涉。1914 年 6 月 29 日，外交部依此通知俄公使，8 個月期滿後不再續訂，以爭取對停戰線外地域的管轄主張。7 月 6 日俄使復照「惟科、阿應各守該約所訂之轄境，不相侵犯」，[157]強調延續條約規定，此界也成為未經民國承認的既成事實。西段攻防、停戰線與科阿分治線的位置關係如圖三。

153 〈收阿爾泰辦事長官（程克）咨．科阿界址之說明〉（1917 年 6 月 3 日），收入《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中華民國六年至八年）》，頁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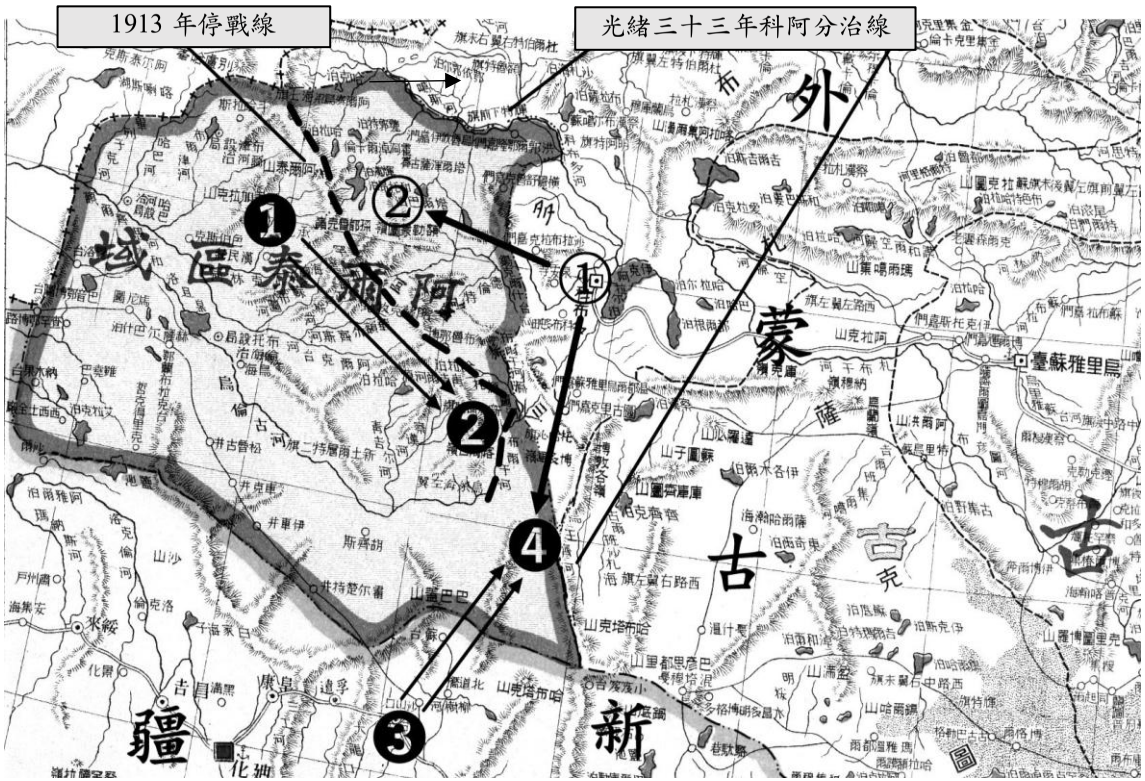
154 〈綏拊蒙民令〉（1913 年 12 月 28 日），收入《袁世凱全集》第 24 卷，頁 543。

155 以上引文詳見〈聲明另件〉，收入不著編者，《中俄邊界條約集（俄文漢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頁 138。

156 呂一燃，〈民國初年沙俄對阿爾泰地區的侵略〉，收入氏著，《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 188。

157 呂一燃，〈民國初年沙俄對阿爾泰地區的侵略〉，頁 19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三　1913 年西段（阿爾泰）攻防路線、停戰線與科阿分治線位置關係示意

說　　明：民國初年地圖均未畫出科阿分治後的阿爾泰區域，1917 年後的地圖，阿爾泰已經併入新疆，均不能表示 1913 年的實際狀況，只有採用 1917 年商務印書館地圖才能呈現。

⟶ 為庫倫當局進攻方向，⟶ 為北京政府出兵方向。

庫倫當局占有地：①科布多②阿爾泰烏梁海　　北京政府兵力集結地：❶承化寺❷布爾根河❸奇台、古城❹察罕通古

資料來源：〈外蒙古、綏遠特別區域、察哈爾特別區域、阿爾泰區域〉（局部），收入陳鎬基編，《中國新輿圖》（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

庫倫當局未參與《中俄聲明》談判，諸多具體問題無法妥定，如聲明第五款規定將另行商定各自利益，為隨後「中俄蒙談判」預留空間。1914 年 9 月 9 日，「中、俄、蒙」在恰克圖開始談判會議，外蒙自治範圍邊界成為談判的重中之重。經過爭鋒，1915 年 6 月 7 日《中俄蒙協約》簽字，其中描述外蒙自治邊界為：

> 自治外蒙區域……其與中國界線，以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屬，東與呼倫貝爾，南與內蒙，西南與新疆省，西與阿爾泰接界之各旗為界。[158]

再次確認 1913 年中俄〈聲明另件〉所定範圍。自此，外蒙與呼倫貝爾之間，以清朝雍正、道光朝設立的 19 座卡倫以及哈勒欣河為界；外蒙與內蒙之間，大致以瀚海戈壁中的內外蒙旗傳統界為分界線，之後在 1916 年北京政府為追擊巴布扎布，越界至外蒙游格吉廟時，俄國立即警告駐庫倫的陳籙（1877–1939）：「內、外蒙本有界限，自不應隨意侵越」，[159] 可見此界帶來的軍事敏感性；外蒙與阿爾泰的分界線實際並未以《中俄蒙協約》所定「西與阿爾泰接界之各旗為界」，而是以 1913 年《臨時停戰條款》規定的「阿爾泰山分水嶺—布爾根河」為控制線，切開了各部落傳統地域，使民國無法管轄阿爾泰山山麓東北的阿爾泰烏梁海地區，隨後阿爾泰行政區歸入新疆，設為阿山道，科布多、阿爾泰之間的控制線分界大致成為外蒙與新疆分界的北段。雖然之後民國各版地圖均把阿爾泰烏梁海、布爾根河流域劃入新疆，但實際已無法管理此地，日後的中蒙分界西北段繼承 1913 年停戰線，以阿爾泰山最高分水嶺為界。

清前期，隨著朝廷在藩部劃定旗界，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各部之間形成了由旗界組合而成的習慣界線，形成各旗、各部落傳統地域。由於同屬藩部，朝廷對各部之間習慣界線的管理停留在地方事務層面（《尼布楚條約》、《布連斯奇條約》等邊界條約並未改變由蒙旗地方負責巡邊的傳統模式）。所以此次戰爭形成的內外蒙軍事分界、科阿停戰線，

158 《中俄蒙協約》，收入不著編者，《中俄邊界條約集（俄文漢譯本）》，頁 140。
159 陳籙，〈駐紮庫倫日記卷一〉，頁 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具有一定的國家軍事意義，並在 1915 年《中俄蒙協約》達成後大致成為自治與非自治區域的界線，上升到區分國家不同管轄方式區域的政治層面，如稍後處理科布多問題的官員徐震時所言：「惟完全行政區與自治區域，在領土中當然有別，自應明定範圍，以杜侵略」，[160]顯示官方重視這條界線的政治區分性。民國之後時期，各段又有部分地域小幅改變，就此問題筆者將另文探討。

結　語

清末民初的國家轉型促進了蒙古的民族意識，如黃麗生總結：「受到近代民族主義的影響，蒙古民族意識在族裔和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可以發展為以蒙古為單一民族的國族。」[161]庫倫當局便是藉此意識向西、南兩方向擴張，希望凝聚更廣泛的蒙古地區；這種認同得到一定響應，造成「二十世紀中國和蒙古之間最大的衝突」。[162]但就結果而言，庫倫當局 1913 年的西進、南下均未達成目標。對於外蒙無法合併內蒙古的原因，學界多半強調蒙古各地區差異懸殊，藍美華進一步指明關鍵：「庫倫政府缺乏效能……使得彼此間無法持續合作以達成共同目標。」[163]

在前人成果基礎上，本文希望補充外蒙古在軍事和組織動員方面的缺陷，以及與此對照之北京政府的臨機處置。在軍事方面，南下蒙軍吸納的大量內蒙流寇不善戰術，俄國軍官不能如意指揮，[164]戰鬥力並不強。如百靈廟戰役後，陸軍八十混成團徐廷榮總結「我軍此次征蒙，以久練之士兵而戰毫無教育之匪，其勝也固宜」。[165]在組織方面，庫倫當

160 〈收駐科佐理員（徐震時）呈〉（1917 年 1 月 23 日），收入《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中華民國六年至八年）》，頁 16。

161 黃麗生，《蒙古意識與中國認同的糾葛》，頁 17。

162 周太平，〈關於博克多汗軍隊 1913 年向內蒙古採取的軍事行動〉，頁 487。

163 藍美華，〈內蒙古與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頁 419。

164 〈陳劉庫匪之策致大總統電〉（1913 年 3 月 7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78。

165 陸軍第八十混成團編印，〈征蒙戰事詳記〉，頁 12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局一面要求內蒙王公盡力開闢臺站確保軍需，支持南下行動；另一方面又利用內蒙各旗反王公的基層力量，如內蒙東部官保扎布帶領亂民搶掠旗王府、內蒙西部「獨貴龍」抗墾組織等。這些本質對立的上、下層無法包容進同一場「革命」，自然無法掌控局面。在動員方面，庫倫當局動員內蒙的方式多為直接封賞外附者，貪利之徒在內蒙煽惑鄉民舉家遷往庫倫，喀喇沁旗發現有人「已將錢散給數十家，俟招齊後一同往庫」，[166]但流民移居外蒙後無法獲得安置，庫倫當局發給每人每月盧布 6 元，讓他們「自備槍馬糧食，令速南下」，[167]如此往復，不僅消耗戰鬥力，更帶來嚴重問題——財力枯竭。不久俄國觀察到：

> 庫倫政府奉行徒勞無益、曠日持久之進攻策略耗盡了國力，各蒙旗對貧困之抱怨聲愈來愈高。[168]

以致庫倫當局無法支持軍隊日常供應。戰役正酣時，錫盟貝子廟的蒙軍糧食已「收羅殆盡，斗米易銀二兩，麵一斤易銀一錢，極行缺乏」，[169]缺糧的蒙軍僅能依靠劫掠附近蒙旗為生，自然無法獲得內蒙地方支持。

以上缺陷，使庫倫當局的政權建設嚴重依賴外援。但俄國此時的核心利益在歐洲，只希望將外蒙變為附庸以控制遠東，而無意持續提供戰略資源。反觀北京政府的財政、軍備物資調配明顯優於庫倫當局，在內蒙戰線的東路，善於理財的熊希齡坐鎮熱河，將熱河避暑山莊闢作軍營和倉庫，更不惜動用山莊所存前清皇家珍寶安撫姜桂題等將領，[170]以盡力支援前線。在他的運籌下，北京政府甚至允發債票，用以訂購毛瑟槍

166 詳見〈就庫逆遣人赴內蒙煽惑事致大總統、國務院等電〉（1913 年 6 月 4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591。

167 〈就熱河匪事致大總統、陸參兩部電〉（1913 年 6 月 4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3 冊，頁 588。

168 〈駐蒙古外交代表緊急報告〉（1913 年 11 月 21 日），收入《俄書》，頁 203。

169 〈報告貝子廟等處匪情致北京大總統參謀部陸軍部多倫傅鎮守使林西米統領電〉（1913 年 7 月 7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39。

170 詳見周秋光，《熊希齡傳》，頁 30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000 支、子彈 40 萬粒，耗資 36 萬兩。[171]米振標軍擁有最先進的槍 2,000 支，每槍配子彈 200 粒，共計 40 萬粒，每次接仗保證提供每槍子彈百餘粒，[172]得以「子彈用盡，隨運隨放」。[173]在內蒙戰線的西路，閻錫山從河東鹽稅項下「撥濟軍餉，以固邊圉」。[174]上述原因決定了北京政府能夠平息「丑年之亂」，鞏固阿爾泰、內蒙等地。

橘誠曾重點探討「蒙古國如何獲得獨立，它的領域如何劃定」，[175]並肯定此戰對確立外蒙政權範圍的價值——即不包含內蒙，但並未注意到停戰線劃分的實際影響。筆者進一步認為，阻止庫倫當局的西進、南下，其結果不僅在於穩定北方局勢，更提升和改變了清朝藩部地方界線的政治屬性和位置。北京政府若無足夠抵抗，雙方的對峙線不一定劃在此地，1915 年「中俄蒙談判」也不一定以此為基礎。回顧 1913 年 12 月 9 日袁世凱下令在內外蒙交界處重設砲卡，21 日帕勒塔也與庫倫當局劃定戰事西段停戰線，實際表達了北京政府無力進入外蒙，默認軍事力量暫以阿爾泰山—布爾根河、內外蒙旗界為界，進而在 1914 年 9 月恰克圖會議上，外蒙自治範圍得到確認。其中西段的界線不再以臣屬部落的傳統地域粗略劃分，而變為清晰的地理界線；南段由清朝前期粗疏劃定的內外蒙旗界演變而來，改變了原先藩部的地方蒙旗界屬性。自此，中國北部的西、南兩線都已上升為軍事—政治分界，後續歷屆政府都在此線基礎上，對北部邊界進行甄別、調整和再確認，最終形成中蒙兩國分界。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吳昌峻）

171 〈就瑞記代購槍炮等事致北京俞匯占電〉（1913 年 7 月 4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23。

172 〈赤峰葉大匡蔣隆基來電〉（1913 年 7 月 7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54。

173 〈請令姜統領派員解送軍需並加派炮隊援米致大總統陸軍部參謀部電〉（1913 年 7 月 6 日），收入《熊希齡集》第 4 冊，頁 37。

174 〈致北京大總統由鹽款撥軍費以利綏遠剿匪電〉（1913 年 5 月 20 日），收入《伯川先生要電錄》，頁 21–22。

175 橘誠，《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研究》，頁 4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一）未刊檔案

〈為巴特瑪多爾濟補授額爾德尼商卓特巴暨車林齊密特補授達喇嘛事〉（光緒九年五月十九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典藏號：03-18-009-000124-0002-0016。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Wei Batemaduoerji bushou Eerdenishangzhuoteba ji Chelinqimite bushou lama shi [Guangxu jiu nian wu yue shijiu ri].” *Junjichu Manwen lufu zouzhe*, 03-18-009-000124-0002-0016. Beijing: Zhongguo diyi lishi dang’anguan.)

《國務院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Guowuyuan dangan*. Nanjing: Zhongguo di’er lishi dang’anguan.)

〈蒙藏事務局呈報開魯戰事及錫盟急迫熱河胡匪擾亂治安等情形的文書〉（1912 年–1913 年），典藏號：1002(2)-71。(“Mengzhangshiwuju chengbao Kailu zhanshi ji Ximeng jipo Rehe hufei raoluan zhian deng qingxing de wenshu [1912–1913].” 1002(2)-71.)

〈蒙藏事務局呈報錫盟各旗擁護共和政體及蒙匪擾亂情形等文書〉（1912 年 10 月–1913 年 12 月），典藏號：1002(2)-72。(“Mengzangshiwuju chengbao ximenggeqi yonghugonghezhengti ji mengfei raoluan qingxingdeng wenshu [October 1912–December 1913].” 1002(2)-72.)

〈署理察哈爾都統何宗蓮等呈報事〉（1912 年 12 月 4 日），典藏號：1002-332。(“Shuli Chahaer dutong Hezonglian deng chengbao shi [December 4, 1912].” 1002-332.)

科布多辦事大臣錫恆，〈為會奏遵擬科阿劃疆分治等因一摺理藩部會同度支部議奏奉旨相應粘抄原奏摺稿並恭錄諭旨咨行事致陸軍部〉（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兵部－陸軍部南京移交》，典藏號：15-01-001-000046-0086。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Kebuduo banshi dachen Siheng. “Wei huizou zunni Ke A huajiang fenzhi dengyin yizhe Lifanbu huitong Duzhibu yizou fengzhi xiangying nianchao yuan zouzhegao bing gonglu yuzhi zixing shi zhi Lujunbu [Guangxu sanshisan nian er yue ershiliu ri].” *Bingbu－Lujunbu Nanjing yijiao*, 15-01-001-000046-0086. Beijing: Zhongguo diyi lishi dang’anguan.)

總管內務府，〈為查明迎迓章嘉呼圖克圖來京正白旗羊群協領拉木色楞應予獎敘等項事致察哈爾都統衙門〉（1912 年 12 月），《內務府呈稿》，典藏號：05-08-033-000010-0045。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Zongguanneiwufu.”Wei chaming yingya Zhangjiahutuketu laijing zhengbaiqi yangqun xieling Lamuseleng yingyu jiangxu deng xiangshi zhi Chahaer dutong yamen [December 1912].” *Neiwufu chenggao*, 05-08-033-000010-0045. Beijing: Zhongguo diyi lishi dang’angu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已刊檔案與文獻

不著編者，《中俄邊界條約集（俄文漢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Anonymous. *Zhong E bianjie tiaoyue ji [Ewen Hanyi be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197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俄關係史料・外蒙古（中華民國六年至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9。(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ed. *Zhong E guanxi shiliao, Waimenggu [Zhonghuaminguo liu nian zhi ba nian]*.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1959.)

中華民國外交部政務司文書科編，〈庫倫、烏里雅蘇台「獨立」案〉，收入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 5–6。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Zhonghuaminguo waijiaobu zhengwusi wenshuke, ed. “Kulun, Wuliyasutai ‘duli’ an.” In *Beiyang zhengfu shiqi de menggu diqu lishi ziliao*, edited by Lü Yiran, 5–6. Haerbin: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1999.)

——，〈蒙兵進犯科布多案〉（1912 年 7–12 月），收入呂一燃編，《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歷史資料》，頁 6–8。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Zhonghuaminguo waijiaobu zhengwusi wenshuke, ed. “Mengbing jinfan Kebuduo an.” [July–December 1912]. In *Beiyang zhengfu shiqi de menggu diqu lishi ziliao*, edited by Lü Yiran, 6–8. Haerbin: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1999.)

內蒙古檔案館編，〈關於「烏泰事件檔案選錄」〉，《內蒙古檔案史料》1993 年第 3 期，頁 7–21。(Neimenggu dang’anguan, ed. “Guangyu ‘Wutai shijian dang’an xuanlu.’” *Neimenggu dangan shiliao*, no. 3 [1993]: 7–21).

包頭市地方志辦公室等編，李曉秋點校，《包頭市志》，收入內蒙古圖書館等編，《內蒙古歷史文獻叢書》第 8 冊上。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9。(Baotou shi difangzhi bangongshi et al., eds., Li Xiaoqiu, annotated. *Baotou shi zhi*. In *Neimenggu lishi wenxian congshu*, vol. 8 shang, edited by Neimenggu tushuguan et al. Huhehaote: Yuanfang chubanshe, 2009.)

札奇斯欽，《羅布桑車珠爾傳略》。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Zhachi Sichin. *Luobusangchezhuer zhuanglue*. Huhehaote: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2007.)

佚 名，〈調查蒙古邊務意見〉（宣統三年），收入畢奧南整理，《清代蒙古遊記選輯三十四種》上冊，頁 625–650。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Anonymous. “Diaocha Menggu bianwu yijian.”(Xuantong sannian). In *Qingdai Menggu youji xuanji sanshisizhong*, vol. shang, edited by Bi Aonan, 625–50. Beijing: Dongfang chubanshe, 2015).

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Song Xilian. *Yingquan jiangjun—Song Xilian zishu*.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1986.)

忒莫勒等主編，《中國邊疆研究文庫・初編・北部邊疆卷》。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Temole et al., eds. *Zhongguo bainjiang yanjiu wenku, chubian, beibu bianjiang juan*. Haerbin: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秋光，《熊希齡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Zhou Qiuguang. *Xiong Xiling zhuan.* Tianjin: Baihua Wenyi chubanshe, 2006.)

——編，《熊希齡集》第 3、4 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Zhou Qiuguang, ed. *Xiong Xiling ji*. Vol. 3–4. Changsha: Hunan renmin chubanshe, 2008.)

周樹模，〈庫倫勸告蒙旗獨立已調隊馳往彈壓〉（1912 年 1 月 15 日），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清宮辛亥革命檔案彙編》第 74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Zhou Shumo. "Kulun quangao mengqi duli yi diaodui chiwang tanya." [January 15, 1912] In *Qinggong Xinhai geming dangan huibian*, vol. 74, edited by Zhongguo diyi lishi danganguan and Haixia liangan chuban jiaoliu zhongxin. Beijing: Jiuzhou chubanshe, 2011.)

金啟孮，《北京郊區的滿族》。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Jin Qicong. *Beijing jiaoqu de Manzu*. Huhehaote: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1989.)

軍事科學院編，《中國近代戰爭史》第 3 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4。(Junshi kexueyuan, ed. *Zhongguo jindai zhanzhengshi*. Vol. 3. Beijing: Junshi kexue chubanshe, 1984.)

烏力吉套格套整理校註，《民國《政府公報》蒙古資料輯錄》第 1 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Wulijitaogetao, annotated. *Minguo* Zhengfu gongbao *Menggu ziliao jilu*. Vol. 1. Huhehaote: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2016.)

馬鴻逵，《馬少雲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公司，1994。(Ma Hongkui. *Ma Shaoyun huiyilu*. Taipei: Longwen chuban gongsi, 1994.)

章藏珍口述，〈施用巧計智擒「活佛」〉，收入文斐編，《我所知道的馬鴻逵家族》，頁 11–12。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Zhang Zangzhen, dictate. "Shiyong qiaoji zhiqin 'huofo.'" In *Wo suo zhidao de Ma Hongkui jiazu*, edited by Wen fei, 11–12.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2004.)

陳　籙，〈駐紮庫倫日記卷一〉，收入氏著，《蒙事隨筆》，頁 53–92。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Chen Lu. "Zhuzha Kulun riji, vol. 1." In *Mengshi suibi*, 53–92.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4.)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編——關於蒙古問題》。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Chen Chunhua, trans. *E guo waijiao wenshu xuanbian—Guanyu Menggu wenti*. Haerbin: Heilongjaing jiaoyu chubanshe, 1991.)

陳崇祖，《外蒙古近世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Chen Chongzu. *Waimenggu jinshishi*.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26.)

博彥滿都，〈我所知道的賓圖王棍楚克蘇隆〉，收入內蒙古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內蒙古近現代王公錄》，頁 129–134。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史書店，1988。(Boyanmandu. "Wo suo zhidao de Bintuwang Gunchukesulong." In *Neimenggu jinxiandai wanggong lu*, edited by Neimenggu wenshi ziliao weiyuanhui, 129–34. Huhehaote: Neimenggu wenshi shudian, 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路生、駱寶善、村田雄二郎編，《辛亥時期袁世凱秘牘（靜嘉堂文庫藏檔）》。北京：中華書局，2014。(Liu Lusheng, Luo Baoshan, and Murata Yujiro, eds. *Xinhai shiqi Yuan Shikai midu [Jingjiatang wenku cangda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4.)

盧明輝編，《巴布扎布史料選編》。呼和浩特：中國蒙古史學會，1979。(Lu Minghui, ed. *Babuzhabu shiliao xuanbian*. Huhehaote: Zhongguo menggushi xuehui, 1979.)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伯川先生要電錄》。臺北：閻伯川先生紀念會，1996。(Yan Bochuan xiansheng jinianhui, ed. *Bochuan xiansheng yaodian lu*. Taipei: Yan Bochuan xiansheng jinianhui, 1996.)

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Luo Huimin, ed. *Qingmo minchu zhengqing neimu*—Taiwushibao *Beijing jizhe, Yuan shikai zhengzhi guwen George Ernest Morrison shuxinji.* xiajuan, translated by Liu Guiliang et al. Shanghai: Zhishi chubanshe, 1986.)

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Luo Baoshan and Liu Lusheng, eds. *Yuan Shikai quanji*. Zhengzhou: Henan daxue chubanshe, 2013.)

蘇聯科學院等編，巴根等譯，《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Sulian kexueyuan et al., eds. *Menggu renmin gongheguo tongshi*. Translated by Bagen et al.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1958.)

拉爾森（藍理訓，Frans August Larson）著，張建軍譯，《蒙古公爵拉爾森（藍理訓）：一位瑞典傳教士的回憶》。臺北：民國文化學社，2023。(Frans August Larson. *Menggu gongjue Larson [Lan Lixun]: Yiwei Ruidian chuanjiaoshi de huiyi*. Translated by Zhang Jian-jun. Taipei: Minguo wenhua xueshe, 2023.)

廓索維慈著，王光祈譯，《庫倫條約之始末》。上海：中華書局，1932。(Ivan J. Korostovet. *Kulun tiaoyue zhi shimo*. Translated by Wang Guanqi. Shanghai: Zhonghua shuju, 1932.)

二、近人研究

呂一燃，〈民國初年沙俄對阿爾泰地區的侵略〉，收入氏著，《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頁 182–198。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Lü Yiran. “Minguo chunian Shae dui Aertai diqu de qinlue.” In *Zhongguo beibu bianjiang shi yanjiu*, 182–98. Haerbin: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1998.)

呂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Lü Qiu-wen. *Zhong E Waimeng jiaoshe shimo*. Taipei: Chengwen chubanshe, 1976.)

李毓澍，〈科阿分界研究〉，收入氏著，《蒙事論叢》，頁 119–170。臺北：里仁書局，1991。(Li Yu-shu. “Ke A fenjie yanjiu.” In *Mengshi luncong*, 119–70. Taipei: Liren shuju, 1991.)

周太平，〈關於博克多汗軍隊 1913 年向內蒙古採取的軍事行動〉，收入齊木德道爾吉主編，《蒙古史研究》第 7 輯，頁 460–487。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Zhou Taip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uanyu Bokeduohan jundui 1913 nian xiang Neimenggu caiqu de junshi xingdong." In *Menggushi yanjiu*, vol. 7, edited by Qimudedaoerji, 460–87. Huhehaote: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2003.)

——，《二十世紀前內蒙古政治變遷史研究——丑年之亂考》。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Zhou Taiping. *Ershi shiji qian Neimenggu zhengzhi bianqianshi yanjiu: Chounian zhiluan kao*. Huhehaote: Neimenggu jiaoyu chubanshe, 2006.)

周學軍，〈哲布尊丹巴政權「內閣總理大臣」設置考——兼與呂一燃先生商榷〉，《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3 年第 3 期，頁 69–82。(Zhou Xuejun. "Zhebuzundanba zhengquan 'Neige zongli dachen' shezhi kao—Jian yu Lü Yiran xiansheng shangque." *Zhongguo bianjaing shidi yanjiu*, no. 3 [1993]: 69–82.)

——，〈達里岡愛被外蒙古占領時間考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 年第 4 期，頁 101–110。(Zhou Xuejun. "Daligangai bei Waimenggu zhanling shijian kaobian." *Zhongguo bianjaing shidi yanjiu*, no. 4 [2000]: 101–10.)

阿拉坦巴根，〈1913 年錫林郭勒——察哈爾戰事初探〉。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碩士論文，2008。(Alatanbagen. "1913 nian Xilinguole－Chahaer zhanshi chutan." Master Thesis, Neimenggu daxue mengguxue xueyuan, 2008.

哈　斯，〈民國初期內蒙古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政局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5。(Hasi. "Minguo chuqi Neimenggu Wulanchabu, Yikezhao liangmeng zhengju yanjiu." PhD diss., Neimenggu daxue lishi xuexi, 2015).

徐建平，〈清中期以來阿爾泰山地區分界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3 期，頁 56–67。(Xu Jianping. "Qing zhongqi yilai Aertaishan diqu fenjie yanjiu." *Fudan xuebao (shehuikexueban)*, no. 3 [2018]: 56–67.)

張臨希，〈達里岡愛歸屬變遷詳考〉，《清史研究》2025 年第 5 期，頁 160–174。(Zhang Linxi. "Daligangai guishu bianqian xiangkao." *Qingshi yanjiu*, no. 5 [2025]: 160–74.)

黃麗生，《蒙古意識與中國認同的糾葛：民初外蒙古獨立運動與內蒙古的反應》。臺北：蒙藏委員會，2002。(Huang Li-sheng. *Menggu yishi yu Zhongguo rentong de jiuge: Minchu Waimenggu duli yundong yu Neimenggu de fanying*. Taipei: Mengzang weiyuanhui, 2002.)

樊明方，《中國北部邊疆史若干問題研究》。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Fan Mingfang. *Zhongguo beibu bianjiangshi ruogan wenti yanjiu*. Xian: Xibei gongye daxue chubanshe, 2012.)

藍美華，〈內蒙古與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漢學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2005 年 6 月，頁 393–425。(Lan Mei-hua. "Neimenggu yu 1911 Menggu duli yundong." *Hanxue yanjiu* 23, no. 1 [June 2005]: 393–425.)

E. A. 別洛夫著，陳春華譯，〈1912 年至 1913 年期間喀爾喀軍隊進犯內蒙古〉，收入齊木德道爾吉主編，《蒙古史研究》第 8 輯，頁 342–347。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Е. А. Белов. "1912–1913 nian qijian Kaerka jundui jinfan Neimenggu." Translated

臺灣大學学術期刊

by Chen Chunhua. In *Menggushi yanjiu*, vol. 8, edited by Qimudedaoerji, 342–47. Huhehaote: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2005.)

中見立夫著，甘旭蘭譯，〈海山與烏泰——博格多汗政權下的漠南蒙古人〉，收入內蒙古大學編，《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 3 輯，頁 59–97。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Nakami Tatsuo. “Haishan yu Wutai: Bokeduo zhengquan xia de monan Mengguren.” Translated by Gan Xulan. In *Neimenggu jindaishi yicong*, vol. 3, edited by Neimenggu daxue, 59–97. Huhehaote: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1992.)

保羅・海爾（Paul Hyer）著，烏蘭少布譯，〈蒙古獨立運動中的內蒙古 1911–1914〉，收入內蒙古大學中共內蒙古地區黨史研究所編，《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 1 輯，頁 94–113。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Paul Hyer. “Menggu duli yundong zhong de Neimenggu 1911–1914.” Translated by Wulanshaobu. In *Neimenggu jindaishi yicong*, vol. 1, edited by Neimenggu daxue zhonggong Neiemnggu diqu dangshi yanjiusuo, 94–113. Huhehaote: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1986.)

彭查格諾羅布著，亦鄰真譯，〈活佛政府為建立「大蒙古國」而進行的鬥爭〉，收入內蒙古大學歷史系蒙古史研究室編，《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第 9 輯，頁 43–48。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1964。(Pengchagenuoluobu. “Huofo zhengfu wei jianli ‘Da Menggu Guo’ er jinxing de douzheng.” Translated by Yi Linzhen. In *Menggu shi yanjiu cankao ziliao*, vol. 9, 43–48. Huhehaote: Neimenggu daxue Menggu shi yanjiushi, 1964.)

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著，苑默文譯，《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臺北：時報文化，2021。(Michael Dillon. *Menggu guo: Yibu tudi yu renmin dianbo qianxing de bainian duli shi*. Translated by Yuan Mo-wen. Taipei: Shibao wenhua qiye gufen youxian gongsi, 2021.)

橘　誠，〈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内モンゴル統合の試み——シリーンゴル盟を事例として〉，《東洋學報》第 87 卷第 3 號，2005 年 12 月，頁 351–382。(Tachibana Macoto. “Bogudohān seiken no Naimongoru tōgō no itami: Shirīngoru mei wo jirei toshite.” *Tōyō gakuhō* 87, no. 3 [December 2005]: 351–82.)

——，《ボグド・ハーン政権の研究：モンゴル建國史序説 1911–1921》。東京：風間書房，2011。(Tachibana Macoto. *Bogudo-hān seiken no kenkyū: Mongoru kenkoku shi josetsu 1911–1921*. Tokyo: Kazama shobō, 2011.)

三、地圖

〈中國全圖〉，收入陳鎬基編，《中國新輿圖》，無頁碼。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Zhongguo quantu.” In *Zhongguo xinyutu*, edited by Chen Gaoji, n.p.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13.)

〈外蒙古、綏遠特別區域、察哈爾特別區域、阿爾泰區域〉，收入陳鎬基編，《中國新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頁 25。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Waimenggu, Suiyuan tebei quyu, Chahaer tebie quyu, Aertai quyu.” In *Zhongguo xinyutu*, edited by Chen gaoji, 25.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6 (December 2025), pp.39–87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512_(76).0002

The War along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1913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marcation of the Sino-Mongolian Border

Zhang, Linxi*

Abstract

Upon declaring independence from the Qing Empire in 1911, Outer Mongolian leaders strived to establish a pan-Mongolian regime. Following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failure of the nascent Chinese Republic to establish effective control over several lama temples in Inner Mongolia freed those temples to align themselves with Outer Mongolia. In turn, this gave Outer Mongolia a launch pad for invading Inner Mongolia and for building ties with pro-independence and pan-Mongolian groups in Inner Mongolia. Relying on Russian support, the Outer Mongolian advance was spearheaded by several turncoat generals from Inner Mongolia. After invading Inner Mongolia on 25 October 1912, the Outer Mongolian forces then advanced westwards into the Altai region in the spring of 1913 and took advantage of the unrest during the Second Revolution to launch an even greater offensive, engulfing the entire northern frontier in the flames of war, leading to the most intens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authorities of Outer Mongolia. The Beijing government bestowed official titles upon the two living Buddhas to weaken the Outer Mongolians' religious influence over the local population, and capitalized on the Outer Mongolians' logistical weaknesses to thwart their adv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Beijing government responded to the "nomadic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ompilation & Research Center of the Qing History unde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China, Committe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Qing History
No. 16, Suzhou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0, China;
E-mail: zhanglinxi@pku.edu.cn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ctics" of the Outer Mongolians by "temple hopping," which allowed them to recapture much territory.

In the summer of 1913, Xiong Xiling and Ma Fuxiang annihilated the left and right wings of the Mongolian forces advancing southward, while Yang Zengxin and Palta repulsed their westward thrust. Consequently, only the Mongolian force in the center (i.e., directly facing inner Mongolia) remained intact. When the Second Revolution broke out in the south, Outer Mongolia capitalized on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its mobilization efforts, then proceeded to negate the erstwhile advantage enjoyed by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fter the Second Revolution ende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successfully won over several Inner Mongolian generals and convinced them to switch sides. Moreover,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urned the tide of the war in its favor by coordinating maneuvers by various units across military zones in the north, eventually forcing the Russians to pressure the Outer Mongolians into withdrawing their troops.

In late 1913,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the Kuriye authorities signed an armistice along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Along the southern sector of that line, the border between local banners was transformed into a defensive line garrisoned by the troops of two opposing nation states; the western sector bisected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of tribes in the Altai region, thereby changing the previous practice under the Qing of drawing national boundaries according the territories of trib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set the China-Mongolia border ever since.

Keywords: Xiong Xi-lin, Yuan Shih-kai,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he Outer Mongol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